國家發展研究　第十卷第一期
2010 年 12 月　頁 97-158

論客家與現代中國革命之關係
——以太平天國和辛亥革命為例

顧　朋*

收稿日期：2010 年 2 月 24 日　　接受日期：2010 年 9 月 23 日

* 伊朗 Imam Sadiq University 宗教政治研究所畢業，現爲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並兼任國立政治大學波斯語講師。專長研究爲國際關係、中東與中亞研究、客家研究、孫中山研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摘　要

本文試圖探討客家人在現代中國革命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主要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廣泛討論客家與中國革命運動之關係，包括太平天國起義和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團體和活動；第二部分則以孫中山爲主軸，除了討論其本身的客屬問題，也藉由觀察其周邊參與其革命事業之志士的籍貫身份，來析論其所設立的革命組織（以興中會和同盟會爲主）、革命戰役（以惠州和黃花崗起義爲主）、革命軍（以黃埔軍校爲主）與客家的關係；最後亦談及也是客家人的羅福星在臺灣的抗日運動，以此作爲探討孫中山辛亥革命與臺灣之關聯的切入點。

關鍵詞：客家、中國革命、孫中山、羅福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研究動機

對於來自遙遠伊朗的我來說，客家這個主題可謂一個陌生的領域。當然，我在伊朗曾經聽過孫中山先生，也對中國的革命有一些瞭解。但是客家，無論作爲一個族群或文化，對我來說都是一個挑戰性很高的新領域。但另一方面來說，我過去在臺灣作中國研究時，「客家」這兩個字是常常遇到的。

研究中國現代政治時，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必定是個無法迴避的主題。再來就是令中國從君主政權走向現代民主政治的孫中山革命，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嶄新的一頁。而在日後冷戰初起時，中國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成立了世界最大的共產國家，從此中國繼續陷入一連串的動盪和不安之中。到了 70 年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則爲中國帶來近兩三百年中前所未有之政治上的安定與經濟繁榮。

至於位於海峽另一邊的臺灣，自 1988 年李登輝接任總統以來，將臺灣帶進另一個新的民主時代，也使臺灣社會更加開放。也正是在這個大環境的土壤培育下，臺灣的社會運動得以風起雲湧（如還我母語運動等等），獲得很大的發展空間。

有趣的是，在上文中所談到的所有領導者（洪秀全、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李登輝），全都是客家人。筆者認爲，1840 年鴉片戰爭以後、在中國風起雲湧的革命運動，「客家人」的因素可謂居功厥偉。本文即以太平天國和辛亥革命爲例，對客家與現代中國革命運動之關係進行一個初步的考察。以下分成五部分：前言、客家與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客家與辛亥革命、孫中山在中國革命運動中之客家關係、結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貳、前言

關於客家與中國現代革命之研究，是在 1990 年代後，隨著客家研究進入第二波高峰，才陸續出現相關專書專論。[1] 但在這之前，並非沒有人討論。羅香林在 1933 年的《客家研究導論》中即闢一章節（第八章）專門論述客家與近代中國的關係。然而在羅香林之前，首先觀察到或提出客家在現代中國歷史上所扮演之角色者，其實是外國的傳教士或研究者，他們注意到太平天國的領袖洪秀全是客家人的這個事實。1912 年，英國傳教士艮貝爾（George Campbell）在英國長老會和美國浸禮會於汕頭開會時報告客家人的歷史和現狀，他說：

> 客家人比城裡人勇敢，富有特立獨行的氣慨，渴愛自由……滿州人入主中國，客家人降服得最遲，並且曾經一再地起兵反正。第一次就是太平天國的事，第二次「就是這世紀內新近的事」。（潘光旦〔譯〕，1929：51）

這段記載爲美國學者亨丁頓（Ellsworth Huntington）於其著作《種族的品性》（*The Character of Races*）中所引用的。而他自己亦於該著作中寫道：「太平天國的領袖洪秀全是客家人……」。（潘光旦〔譯〕，1929：51）

以上兩則可以說是最早正式提出客家與中國現代革命，及政治之關係的記錄。而在羅香林之前，第一個論及這個題目的中國學者是古

[1] 關於客家研究與論述，大約肇始於 19 世紀中葉，然後直至 1933 年羅香林教授發表《客家研究導論》一書以及在 50 年代時出版《客家源流考》這兩種奠定客家研究基礎的重要著作爲止，可以視爲客家研究的第一波。之後一直到 80 年代，才又有較多學者開始著眼於客家研究，如施添福、尹章義、莊英章等，客家研究由此進入第二波的研究高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直。1930 年，古直著作《客人對》，在下卷中正式談及客家人在中國歷史上盡忠愛國的表現，包括南宋末文天祥抗元時，「兵勢至梅州而大振，男執干戈，女貫甲裳，舉族赴義」、「清季花縣洪天王清半壁，建國太平，百戰天亡，亙十七年，則民族革命之初祖也」、以及「以迄民國之成，紅花黃花之烈士、南征北伐之虎將、文昭武烈之輔相」均爲客家人。（古直，1970：51-54）

本文擬以孫中山爲主軸，來探討客家人與中國現代革命之關係。惟因太平天國洪楊革命對年少時的孫中山影響甚深，[2] 且兩人也都是客家人，故本文首先討論太平天國與客家的關係，進而探討孫中山在中國革命中之客家關係。

參、客家與太平天國革命運動

一、關於太平天國領導者的考證

(一) 天王洪秀全（1814～1864）

關於洪秀全之家世，最早的記載可見諸瑞典籍傳教士韓山文（Theodore Hamburg）所寫之《太平天國起義記》；[3] 該書提及洪氏

---

2 孫中山年幼時曾聽太平天國老戰士馮爽觀講述洪秀全事蹟，心生嚮往。後來開展革命事業時，孫中山也經常談到太平天國。如 1902 年，孫中山囑劉成禺撰寫《太平天國戰史》，意在勉勵「洪門諸君子……世守其志而勿替也。」（孫中山，1956：55）而成立同盟會時，「同盟會宣言」亦提到：「本會以異族潛亂，天地慘黷，民不聊生，負澄清天下之任，使朱明之緒不絕，太平之師不熸，則猶漢家天下，政由已出，張弛自易。」

3 此書原名爲《洪秀全之異夢及廣西亂事之始原》（*The Visions of Hung-Siu-ts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爲韓山文根據洪秀全族弟洪文玕所留給他的文件寫成。後簡又文先生在翻譯時爲求言簡意賅，始譯爲《太平天國起義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家於第十五代裔孫時說：

> 因受族人之侮辱及壓迫，乃遷居於嘉應州……十五代裔孫經十一傳而至洪貢（Hung Kung）。此人生有四子……四子中賢倫（Jin-lun）與賢會（Jin-wui）最初遷居於廣州北部之花縣。……由賢倫四傳而生洪秀全。（簡又文〔譯〕，1976：8）

韓山文在第二章更寫道：

> 洪秀全之本鄉爲花縣之一小村。……秀全之祖先先由嘉應州遷此，故族人均用嘉應州方言。本地人稱此等客籍民爲「客家」。（簡又文〔譯〕，1976：9-10）

而 1937 年，羅香林根據其所獲得之《洪氏宗譜》考證洪秀全家世，洪氏一族自十五代的十一世祖洪三始遷居至花邑，洪三本人即葬在花邑大水邊芙蓉嶂下；洪三有五子，長英經、次英綸、三英纘、四英絨、五英緯。若以此對照韓山文的記載，兩者在細節上是略有出入的，但大體上可以知道洪貢就是洪三，而洪貢的兒子中，賢倫即英綸；賢會即英緯（蓋對照韓山文原著之羅馬拼音即可推知）。因此羅香林根據《洪氏宗譜》所考證的洪氏家族的遷居史，當屬可信。

(二) 南王馮雲山（1815～1852）

與天王洪秀全同是廣東花縣人，然其祖居廣東龍川縣石灰窖村，廣東龍川是純客住縣，故可推知馮雲山應爲客家。馮雲山可謂洪秀全最早的支持者和追隨者。1844 年春，其與洪秀全一同入廣西貴縣賜谷村傳教，停居於洪秀全表兄王盛均家裡。王盛均一家也都是客家人。（王慶成，2001：48）但因久住難以供養，洪秀全遣馮雲山先歸。於是馮雲山在 1844 年秋天，獨自一人來到貴縣北的紫荊山。初來乍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他以勞力換取溫飽，但未久便得雇主曾槐英惠眼所識，薦入曾玉珍家當教師。（羅爾綱，1958：322-323）太平天國官書《太平天日》亦敍述，馮雲山入紫荊山後，與大衝曾玉珍家有很密切的關係。而這個曾家，也是從福建寧化石壁遷到廣東嘉應州、後又有一支遷入紫荊山的客家人。（王慶成，2001：54-55）

(三) 東王楊秀清（1821/23?～1856）

據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

> 東王楊秀清住在桂平縣平隘山，在家種山燒炭爲業，並不知機，自拜上帝之後，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羅爾綱，1958：324）

蓋桂平在廣西省，羅香林的研究表示廣西省沒有純客住縣，惟其所列出的非純客住縣中則包括了桂平。（羅爾綱，1992：96-97）而《賊情匯纂》記楊秀清的籍貫道：

> 秀清廣西潯州府桂平縣人，……原籍廣東嘉應州。（羅爾綱，1943：92）

蓋嘉應州爲今日梅縣，爲純客住縣，故楊秀清自然是客家人。而羅爾綱（1958：324）在訪問金田的記載中也提及：

> 大衝村對面爲東王衝，乃東王楊秀清故鄉。其地爲燒炭工人區域，都說客家話。楊秀清便是個斬柴燒炭工人。他擔柴到曾家，馮雲山奇其人，就和他結識。

(四) 西王蕭朝貴（1820～1852）

關於蕭朝貴的族屬，世傳其爲僮人。然而若對照一些史料和現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當地的訪談，蕭朝貴很有可能是客家人。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

> 西王蕭朝貴是武宣縣盧陸峒人氏，在家種田種山爲業。（羅爾綱，1958：325）

武宣縣在廣西省，根據劉策奇於《廣西語言概論》中對於廣西客家的描述：

> 麻介話（按即客話），則散佈於各縣的鄉村，但爲數甚少；惟馬平武宣和柳城等縣，所屬鄉村的人民，說麻介話的幾居大半。……又說麻介話的，多是由廣東嘉應潮梅等處遷來，專以墾植爲業。（羅香林，1992：121）

羅爾綱（1943：92）也認爲蕭朝貴是客家人：

> 據民國《桂平縣志》，紫荊山一帶本是猺人出沒的地方，至康熙年間才招人開墾，漸成村落，考當日遠來潯州一帶開墾的人，都是客家人。蕭朝貴、韋昌輝既居住在紫荊山下的村落中，他們大概也就是客家人。

此外，根據廣西太平天國文史調查團對金田地區的田野調查，當地居民說：「蕭朝貴的祖居原住古棚衝的，有一祖墳在屋背右側。解放前有叫蕭五的幾個人每年由武宣東鄉武蘭村來祭掃，都是講客家話的。蕭朝貴是屬長房的，蕭五一支則是屬二房的。」（廣西省太平天國史調查團，1956：38）

倘若再參看《天父天兄聖旨》中蕭朝貴的「聖旨」記錄多客家用語，（鍾文典，1991：9）即可推知蕭朝貴應該是客家人。

(五) 北王韋昌輝（1823/26?～1856）

韋昌輝是廣西省桂平縣金田村人。關於其族屬，儘管 1954 年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廣西省太平天國文史調查團由韋昌輝會說僮語而得出「韋昌輝的民族成份是僮族，大體上得到證實」這個結論。但後來根據《韋氏族譜》序文所言：

> 自予幼小，嘗聞說由我始祖遷居桂平縣宣二里金田村，後分五房，各居一鄉，土名黎垌江、紫荊山之黃鱔衝、朱盞村、洪利村各立一房，惟我金田乃係季房也。

《韋氏族譜》乃韋昌輝之從姪韋以琳所修，近年來，許多學者根據幾種韋氏族譜的研究，指出韋族原籍廣東，遷廣西梧州、潯州平南，至韋昌輝八世祖遷桂平金田，如此推算出韋姓應該是在明末遷來桂平的，並非土著民族。

再據羅爾綱（1958：333-336）所言：

> （韋昌輝之弟）韋志俊有後人，住在安徽宣城紅林橋雙溝村。1928 年新墟人劉某曾經到過他們的家。劉某對我們說:「民國十七年，我們經過安徽宣城紅林橋雙溝村，偶談客家鄉音，村人韋琦聞而驚喜，來和我們攀談，始知道他乃是韋志俊的嫡孫落籍在這裡的。韋琦做藥材生意，家中仍說客家方言。」

上述可證韋昌輝乃客家人。

(六) 翼王石達開（1831～1863）

石達開在供辭中自云：「係廣西貴縣人。……祖輩由廣東和平縣移來貴縣居住。」（簡又文，1983：160-161）既然和平縣是純客住縣，石達開爲客家人應無疑義。而光緒《貴縣志》也記：「石達開，邑之北山里來人。」按光緒《潯州府志》云：「狼僮曰土，廣東惠潮人曰來。」可知在此所謂的「來人」是指自廣東省潮、惠二地遷來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客家移民而言。（羅爾綱，1943：92）此亦可爲石達開爲客家人之旁證。

二、關於太平天國追隨者的考證

(一) 客土械鬥與金田起義

在金田起義前，貴縣、桂平間發生來人與僮人間的大械鬥。來人戰敗被逐，無家可歸，因而投奔金田加入太平軍者數千人。（簡又文，1983：161）

史籍對於客土械鬥的記載相當多，以下引用數則：

> 廣西有客家村落甚多，但不若本地村落之強大。本地人與客家人之感情甚壞，互相仇視，一有事端發生，仇怨更深。其時有客家富人溫姓者納一女子爲妾，此女已與一本地人訂婚，遂起爭執。……縣官每日接收本地人控告此客家人之狀詞無數，不能審判曲直，縣官似乎是畏難故意推宕不理此糾紛；據說縣官暗中卻慫恿本地人自行以武力對待客家人。無論此事確否，客家人與本地人未幾發生械鬥於貴縣境內，復有許多村鄉加入戰團。戰事起於八月二十八日。其始客家佔勝利，因其人好勇鬥，成爲習慣，而且大概兼有賊匪加入作戰。但本地人愈戰愈強，經驗愈富，又以其人數較多數倍，卒將客家人擊敗，焚其屋宇，以故許多客人無家可歸。在此患難中彼等央求拜上帝會教徒之庇護。此時拜上帝會教徒人數約有三千，散居於各縣。客家人甘願遵守教規典禮因而避去仇人之攻擊，且得物質之接濟。（簡又文〔譯〕，1976：52-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三十年夏四月，貴縣土、來鬥。狼、獞曰土，廣東惠、潮曰來。……土人殊死抵禦，互殺四十餘日，賊遂飽掠去。來人見勢孤，急挈家奔南岸，及桂平蒙墟等處。至是，遂合礦徒叛附金田。」又：「賊黨（既起事），……會來人率男婦老弱二千餘人敗走無歸，乃合博白教匪數百聚鬱林白馬江，出桂平大洋大莫村，……一經會合，勢遂滋蔓。（羅爾綱，1981：232-233）

> 達開自幼讀書未成，耕種爲業。道光二十九年，因本縣土人趕逐客家人，無家可歸，同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蕭朝貴、馮雲山共六人聚眾起事，共推洪秀全爲首。（羅爾綱，1981：231）

上述三則記載所講述之土客械鬥的發生時間各異，羅爾綱曾對之加以考證。而從他所引用之清廣西按察使姚瑩《致左江道楊書》：「頃以貴縣土人來人互相讎殺一案，蔓延已久，其勢岌岌。」我們可以看出來土客之爭其實早已延燒了很長的一段時日，（羅爾綱，1981：232-233）所以客家人應該是隨著與當地人之戰事的節節敗退，而分成好幾次投歸金田，加入主要領導者皆爲客家人的拜上帝會，以尋求庇蔭。

相對地，一方面，拜上帝會因爲逢此客土械鬥之時機，獲得了一大群追隨者；另一方面，趁亂同時加入拜上帝會的除了這一大批客家人外，可能還包括一些本來就活動於廣西山區的賊匪（這些賊匪也多是客家人）。[4] 因此拜上帝會與官兵發生衝突乃是勢所難免。[5] 洪秀

4 「廣西山嶺崎嶇，盜賊藏伏，出沒無常，行客及鄉村時遭搶劫。……賊匪多由廣東或鄰省而來，即廣西人所稱爲客家者。」（簡又文〔譯〕，1976：52）

5 「拜上帝教徒多數爲客家人，兇勇耐勞，因此以少數人敢向多數數倍之本地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全便是利用此一時局在金田起義，其可說是由客家人促成的。

(二) 客家農工的大量參與

1. 農人

農民是構成太平天國起義的基本群眾。而這裡所謂的農民，除了一般農夫外，還包括了燒炭工人和「藍工」（實爲「藍農」）。實際上，以紫荊山爲例，居民多以種田耕山爲主，燒炭、種藍爲輔。（鍾文典，1962：132、137）而在清末中國社會裡，人心本已累積相當程度的不滿，位於最基層的農民當然更是飽嚐長年的困苦生活，故當太平天國宣傳革命思想時，他們是最容易受到號召和煽動的一群人，加上本無值得留戀的財產，使他們在投身太平軍時更具有破釜沉舟的決心，如當時的武宣和象州常有整個家或整村參加太平軍；又如當太平軍一到永安州，東鄉夏朝村劉姓百多貧苦農民首先入伍，刁倉村刁姓農民亦大批參加了。這些農人中，許多都是客家人。（鍾文典，1962：135）

至於燒炭工人，羅爾綱即說：「金田起義的基本群是平隘山燒炭工人。這班人都是說客家話的。」[6]前文也曾提及東王楊秀清即是燒炭工人出身；而貧農出身的蕭朝貴，也曾燒炭和種藍。（鍾文典，1962：136）許多地方誌裡記載著在太平天國起義前，廣西地區的桂平、貴縣、平南、藤縣、及廣東高州、信宜各地，已有人開山種藍，製造藍靛。而太平天國起義時，也確實有近千種藍人參加太平軍。在貴縣，

進攻，雖後者有官兵爲助而仍常佔勝利。客家人入會者愈多，遂被捲入漩渦。」（簡又文〔譯〕，1976：55）

6 「平隘山人甚苦，居其地者十有八九做燒炭營生，居民都說客家話。……平隘山爲燒炭工人區域，都說客家話，入會的叫作拜上帝會，居民差不多都信他，因平隘山多貧苦人。」（羅爾綱，1958：3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種藍的人，多是廣東上來尋食沒有地方落業的客人。」（鍾文典，1962：138）

2. 工人

除了農人外，加入太平軍的另一批群眾是礦工。這些礦工主要來自貴縣北的平天山。故《貴縣志》對此有詳細的記載：

> 道光年間，署令王濟開掘縣北隴頭六班諸山銀礦，召集「來人」，五方雜至，良歹不分，其掘而得利者來去不常，缺本者日則開設賭場，夜則潛出爲賊。（羅爾綱，1935：92）

而洪、馮二人曾「潛入平天山，暗結礦工，密圖革命。」（鍾文典，1962：140）

《光緒潯州府志》即載：

> 道光三十年庚戌，有會黨千餘，盜鑄軍械於桂平白沙墟。初貴縣知縣楊曾惠不以捕盜爲事，紅巾賊馮雲山由大墟入龍山，潛煽礦徒爲盜。（羅爾綱，1981：234）[7]

清道光初年，統治者本以礦區「多無籍遊民，往來盤踞，私行開掘，匪類日多，恐遭害累」，故實行封禁。然鴉片戰後，國庫空虛，復開禁並招商採礦。銀礦老闆，多係廣東人。開礦的人，有的是無田可耕、無野可種的本地貧苦農民；有的是無依無靠的來人。（鍾文典，1962：139）據上文可知，來貴縣北山開礦的礦工，許多原本就是貧

[7] 類似的記載也可見《貴縣志》引《潛齋見聞隨筆錄》所記：「道光年間，縣令楊曾惠不以盜賊爲事，逆匪馮雲山遂由大墟入北山里龍山中，潛到開礦之處，糾串匪徒拜會。」（羅爾綱，1943：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苦的客家人，他們在開礦時，受銀礦老闆的剝削，故彼此之間發展出緊密的友情。當馮雲山潛入其中，利用其緊密的向心力號召加入拜上帝會、組織太平軍時，他們雙方應是一拍即合的。在永安建制時任「天官正丞相」的秦日剛就是礦工出身；據考證，秦日綱是廣西桂平白沙祝多塘人，（黃培棋，1991：19-21）乃客家人。[8] 日後金田起義中的礦工隊伍有一支就是他所率領的。

(三) 金田客家大族與太平天國起義

除了客家農工大量參與太平軍，一些客家世家大族也都支持太平天國的革命。[9] 韋昌輝的家族即爲一例。《天情道理書》說：「昌輝…是富厚之家，後因認實天父、天兄，不惜家產，恭膺帝命，同扶真主。」（羅爾綱，1958：326）

而金田曾氏家族與太平軍關係之密切更是世所罕見的。首先是古林社曾家。當馮雲山初入紫荊山時，就是在古林社曾槐英家做苦工。古林社曾氏一族原籍廣東惠州府歸善縣，是客家人，至宗林二公時始遷至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廣西省太平天國史調查團，1956：89）後來也是曾槐英見馮雲山懂詩書，才薦他至大衝村的曾玉珍家教書。而大衝曾家則是從廣東嘉應州遷來桂平的客家人。[10]

以下爲其族譜簡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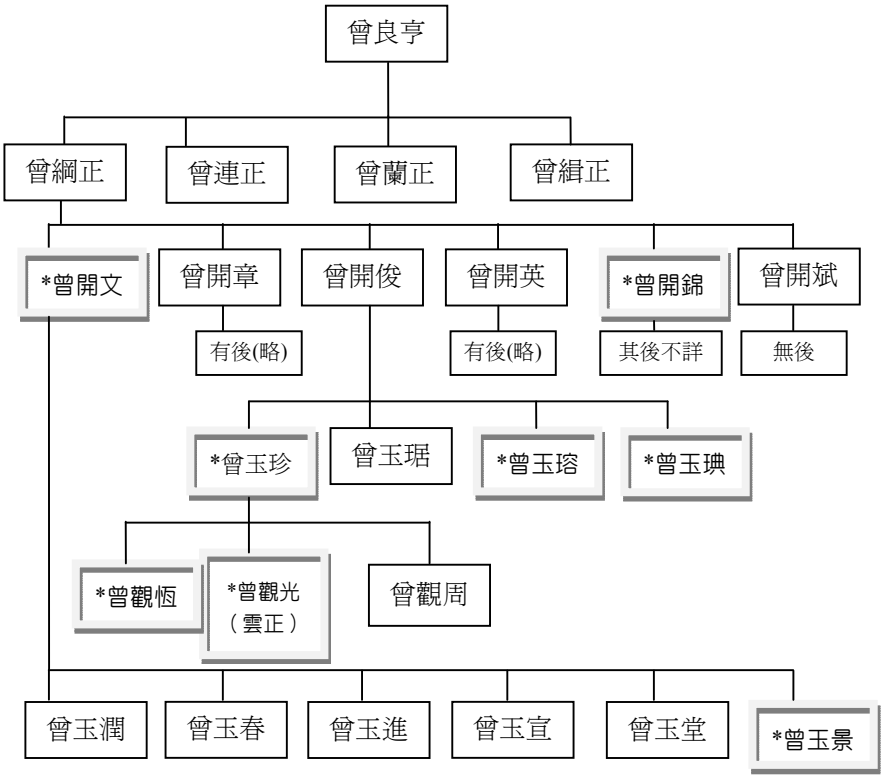
8 「祝多塘有江、朱、李、秦四姓，全村都講客話，秦姓也是講客話的。」（廣西省太平天國史調查團，1956：87）

9 不過也有一些客家大族是反對太平天國革命的，如王氏一族。（王慶成，2001：57-60）

10 關於大衝曾家的族屬源流考證，請參見王慶成（2001）。〈客家與太平天國起義〉，邱權政（編），《客家與近代中國》，頁 55-56。臺北：武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　大衝曾家族譜簡圖



資料來源：王慶成，2001：55-56。

說　　明：打星號者，爲曾氏家族中與太平天國有關的人。

縱觀大衝曾家，與太平天國有關係的至少有八個人。先提曾開文；洪秀全曾至曾開文家教書，作「蛟龍」一對，結果平日與曾家私仇甚深的王家王作新告到官府，官府後來把開文捉去殺了。（廣西省太平天國史調查團，1956：90-91）而曾開文幼子曾玉景，生性機警，篤信道教，深得洪、馮之倚重；（簡又文，1983：25）而後更參加金田起義，從征至永安，但在回鄉攜帶家屬途中被仇家截獲，在桂平被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成爲太平天國起義初期的烈士。（王慶成，2001：57）

再來看曾開俊這房。請馮雲山教書的即爲開俊之長子曾玉珍。玉珍自己雖未參加日後的金田起義，但曾氏全族人在他的率領下全部成爲教徒。（簡又文，1983：26）而其兩個弟弟玉瑢和玉瑛、以及其長子觀恆和次子雲正都參加了金田起義。尤其次子雲正更是馮雲山的熱心信徒，加入拜上帝會後，「不獨不拜偶像，且時常侮弄偶像」，（王慶成，2001：55）幫助馮雲山傳教甚力。又曾開錦，其本人隨太平軍遠征，後無下落。（廣西省太平天國史調查團，1956：91）

三、關於太平天國中的客家元素

太平天國起義可以說是一個從上（領導者）到下（追隨者）都有大量客家人參與的革命運動。也因此無論在太平天國的文書詔令和禮儀規範中，亦或其統治下的社會和政治制度裡，無一不流露出濃厚的客家色彩。

首先，在太平天國的文書中，無論是詔令、誥諭、天父詩、天父天兄聖旨裡，皆罕見地大量使用客家語彙，這類文書若不以客家話來理解，實在令人費解。[11]

再者，在太平天國所制定的規制中，仍保留許多廣西客家的傳統。如楊秀清、蕭朝貴等借用廣西民間中所流行的「降僮」「附身」的信仰，將之轉變成「天父、天兄下凡」以傳聖旨。又其禮拜上帝的儀式雖無燒香焚紙，卻也是備「牲禮茶飯」，跪地祝禱。又如婚喪喜慶等相關規制中，基本上仍是以客家傳統爲基礎，只是將敬神祀祖的儀式改成祭告天父上主皇上帝而已。（鍾文典，1991：5-6）

而實際上，正因爲客家人在太平天國起義中的高度參與率，影響

[11] 詳細討論請參見鍾文典（1991）。〈客家與太平天國革命〉，《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及，待太平天國正式立國後，太平諸王爲履行起義時的承諾，政權中的中高職位全都分派給廣西客家人；此外，更創造了一套「以世襲特權爲主，具體職任爲輔」的官制，用意就是在保證最初參加起義的這批廣西老兄弟。[12] 也因之，廣西客家人盡佔太平政府中的高級統治階層，享受許多特權。前文提及太平天國文書多用客家語，筆者認爲殆與其層峰階級都是客家人脫不了干係。在此，客家人原本緊固、甚至封閉排外的宗族觀念，在太平天國的政體裡得到鞏固，並繼續存活。後來陸續加入太平軍的兩湖、安徽等他省人民，則無法觸及政權的高層，此種上層與下層間日益擴大的隔閡，是造成太平天國後來衰亡的一個內部原因，也是太平天國的客家因素對其政治的影響之一。

四、小結

1847 年秋以前，拜上帝會人數只有三千人左右，其活動地區只限於潯州，1847 年秋以後，拜上帝會人數便成倍數增加，且遠在陸川、博白、玉林、岑溪以及廣東的高州、信宜、羅定和化州各地，也出現了拜上帝會的組織。（鍾文典，1981：208）拜上帝會之所以擴散之快，客家是其中最大的助力。一者，洪秀全、馮雲山利用自己也是客家人之便，在客家村落中大肆傳教。二者，廣西客家人中，若是處於社會邊緣的來人農工，由於其社會和經濟地位的低落，在精神上較易接受一個不同於當地人之主流文化的信仰，以之作爲一個獲得救贖的盼望。[13] 三者，即使是落腳已歷數代的客家大族，雖然家財萬貫，但仍在社會地位上不若當地大族，相較下處於相對弱勢，又或未

[12] 王明前。〈論太平天國政治的客家淵源－兼辨「客家武裝移民說」〉。http://www.ilib2.com/A-ISSN~1004-6917(2006)05-0137-05.html。2009/11/10 檢索。

[13] 王明前。〈論太平天國政治的客家淵源－兼辨「客家武裝移民說」〉。http://www.ilib2.com/A-ISSN~1004-6917(2006)05-0137-05.html。2009/11/10 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獲功名（如曾氏家族），因此洪秀全所傳之帶有強烈西方色彩的新說，對他們便會產生特殊的吸引力。四者，一旦客土械鬥的情況加鉅，更促使客家人投入同是客家人的洪秀全所創立的拜上帝會，以尋求更多支持。

然而，儘管客家人的大量加入使太平天國的金田起義獲得成功，奠定立國基礎；但在短短的十三年間，廣西客家人卻因坐享世襲高層權位，而喪失了原有客家人所具有的優勢特質：質樸的幹勁，以及在遷徙中所歷練出來的奮勇情操。

另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即太平天國的客家因素雖濃，但卻非客家運動。（王慶成，2001：60）太平天國的革命，是置於整個大中國漢人之政治框架中的政治運動，而非作爲一個追求客家意識的族群運動。而這點也明顯地反映在之後陸陸續續地由客家人所肇發的中國現代政治革命中。

肆、客家與中國辛亥革命

本節中所要談論的辛亥革命是指廣義的辛亥革命——從 19 世紀末一直到武昌起義前後的這段期間，支持孫中山反清的客家人物以及在中國各地所組織的客家革命團體。不過關於由孫中山所組織的革命黨及其所發動的起義事件（包括興中會和同盟會的成立以及十一次起義），則待下一章的第一、二節討論。

一、關於孫中山是否爲客家人的考證

在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滿清末年，儘管太平天國已然敗亡，但改革維新的思想已瀰漫了整個中國，人心急於思變，革命的氣氛已在中國各地漸漸蘊釀。孫中山可謂這股革命潮流的集大成者，在他的號召下，無數青年拋頭顱、灑熱血，最終武昌起義，成功地推翻滿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建立共和。因此，孫中山絕對是談到辛亥革命時第一個要談的人物。不可免地，「孫中山是否爲客家人」成爲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

從 20 世紀 30 年代開始，孫中山之祖籍地的問題便浮上檯面，成爲學術界論爭的焦點。大抵上分成兩種說法：「東莞說」和「紫金說」。[14]最初「東莞說」得到大家的認同，包括現代客家學之泰斗羅香林剛開始也同意此說。羅香林對孫中山祖籍的考證導因於他在林百克（Paul Linebarger）的《孫逸仙傳記》（*Sun Yat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第一章看到孫中山自云其家族住在翠亨僅數代，家廟則在東江上的「Kung Kun」。（Linebarger, 1969: 5）他最初亦認爲「Kung Kun」兩個字是「東莞」的音譯，把「東」拼成「Kung」應該只是筆誤。（羅香林，1992：274）

然而後來羅香林發現東江的紫金縣忠壩以前有個「公館背」村，「公館」二字與「Kung Kun」音同，且該地又爲孫氏家族所居。後經查紫金孫氏族於光緒二年所重修的族譜，「第十二世祖諱璉昌公，移居增城，於後未知」，而這位「璉昌公」與翠亨孫氏族譜中之第十二世「孫連昌」只是連與璉二字音同字不同，故羅香林推論這兩個人是同一個人，因此孫中山的先世應是從其十二世祖連昌公自紫金遷至增城，而後又遷中山縣湧口門村，最後至十四世祖再遷至翠亨村。（羅香林，1954：13-14、48）又由於紫金是廣東的純客住縣，故孫中山當是客家人沒錯。

羅香林所提出的「紫金說」後來得到孫中山後人的支持，如孫科就至少兩次提及其祖先是從紫金縣遷至香山縣的。[15] 而早年曾隨侍

---

[14] 關於「東莞說」和「紫金說」的論爭，請參見張詠梅、鄒佩叢。〈略論學術界對孫中山祖籍問題的爭論及我們的看法〉。http://www.wh3351.com/rwzs/rwfc/sun/sun&xs/lzx1.htm。2009/11/18 檢索。

[15] 「孫哲先生手著八十述略中有謂：『我祖先上世於唐朝時，從河南陳留南遷江西寧都，明初由閩西遷廣東省紫金縣，清初由紫金遷香山縣。』……1972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孫中山革命多年的北伐、抗日名將薛岳將軍，也曾告訴臺灣著名客屬研究專家謝福健先生說：「中山先生自己說過，原籍紫金縣，是東江客家人。孫陳淑英夫人也曾在謝先生原著中親簽上：『先翁是客家人，老家在紫金』等字樣。」（楊慶平，1990：68）

在關於孫中山是否爲客家人的所有論辯中，對於譜牒的考證是一個至關緊要的論述依據。然而無論是「東莞說」所引以爲據的「翠亨孫氏家譜」，抑或羅香林「紫金說」對「紫金孫氏族譜」和「翠亨孫氏家譜」的對照，其實都存在著一些問題。[16] 而除了譜牒，當時的訪談也是重要佐證。在這些口述資料中，「纏足」和「孫中山是否諳客語」，成爲兩個論述孫中山是否爲客家人的重要憑據。孫中山家庭裡的女性長輩（包括孫母以及兩位守寡的嬸嬸）皆纏足，（Linebarger, 1969: 28-30）但客家一般婦女是不纏足的，故反對孫中山爲客家人者就以此作爲論據，認爲孫氏一家是廣府本地系人。然而筆者以爲羅香林對此點的解釋是有道理的。羅香林云：「聞之范捷雲（錡）師云：『孫中山，實客家人與廣府本地系之混血種，……』林百克《孫逸仙傳記》第四章，曾述孫公家庭，謂孫公生母，實曾纏足。考客家婦女，從無纏足之風，孫公生母必爲廣府本地系人。據此，則范先生之言，益爲不刊之論矣！」而後羅香林親至翠亨村實地考察後，認爲孫氏「數傳又遷同鎮翠亨村，後來與本地系互通婚媾，至孫父達成（字道川）時，已是當地語系化了。孫母楊氏、及原妻盧氏，皆爲曾經纏足的本地系人，孫公的姊（適楊）妹（已故），亦曾纏足，孫公父子，尚能

世界客屬總會在臺北籌辦第二次懇親大會，……哲公稱父親曾告訴他，老家住東江永安縣（現名紫金），並對客屬從中原南遷，及代出英豪史跡亦知之甚詳。」（楊慶平，1990：68）

16 關於孫氏譜牒問題的討論，請參見邱捷。〈中山先生祖籍問題爭論的由來〉。http://www.sunyat-sen.org:1980/b5/192.168.0.100/sun2007/sunjiasi/sunjiansi103.htm。2009/11/20 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客語，但他姊妹、和母妻，則只能操本地系白話了。」而翠亨村雖非客家村落，但爲客家村落包圍，據羅香林的訪問，當地人說儘管客人和本地人基本上並不相善，但「唯翠亨孫家，則自來主張互相聯合，不肯排客。」（羅香林，1992：264-265）若孫家如羅香林所言爲客家與廣東本地系人通婚的家庭，而孫父又已當地語系化，所居住的翠亨村也非客家村，則孫家的女性按照一般廣東本地人或一般漢人的傳統纏足，就不足爲奇了。而這也並不影響孫中山的血統中仍然保有客家人血統的事實，只是不是純客罷了。此外，這點也能解釋林百克《孫逸仙傳記》第十二章所記述的當孫中山向母親央求不要讓她的姊姊纏足時孫母的回答。[17]

再者，關於孫中山能否講客家話的問題，雖然有些口述說「翠亨孫氏平時講廣東話系統的白話」[18] 或「孫家的後代不講客語」，[19]但更多的口述資料顯示孫中山諳客語，甚至自述其爲客人者。以下引用兩則：

---

17 當孫中山見其姊因纏足而日夜苦痛難當時，向孫母請求不要替姊姊纏足，孫母回答道：「看看客家人！沒有一個客家女人纏腳的。客家人不像本地人或中國人那樣纏腳。」（Linebarger, 1969: 81-82）許多研究者以此論定孫氏一族並非客家人。但筆者以爲既然孫母乃廣東本地系人，而孫父又已然當地語系化，對客家傳統並不強調，所以孫母的回答並無法表示孫家不具客家血統。

18 「中山先生粵語講話錄音的中山白話口音相當明顯。又，筆者曾經向孫滿先生（孫眉長孫）、楊連逢先生（孫妙茜之孫）請教過，兩位都肯定地說，翠亨孫氏的前輩講白話，不講客家話。」（邱捷。〈中山先生祖籍問題爭論的由來〉。）http://www.sunyat-sen.org:1980/b5/192.168.0.100/sun2007/sunjiasi/sunjiansi103.htm 。2009/11/20 檢索。）

19 張詠梅、鄒佩叢。〈略論學術界對孫中山祖籍問題的爭論及我們的看法〉。http://www.wh3351.com/rwzs/rwfc/sun/sun&xs/lzx1.htm。2009/11/18 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 羅香林（1992：263-264）引郭冠傑先生言

「光宣之際，有梅人某君，嘗以革命事，往謁孫公。初相見，其君強操國語，顧字音不正，出口維艱，孫公覩狀，慰曰：『聽君語，粵人也，盍以粵語譚論可乎？』其乃改操廣州白話，顧亦不熟，所言多不達意。孫公曰：『子殆客家人乎？吾當與子講客話也。』其怪孫公能客語，叩曰：『總理亦學客語乎？』孫公曰：『吾家之先，固客人也，安得不解客話？』」

2. 楊慶平（1990：68）記

「有日孫中山在大元帥府接見到訪客家人，對國家大事多有談及，並蒙孫先生多所指示，無不表示敬佩。臨別前，有一位客家人對孫中山先生說：『中山先生，您是客家人？』中山先生肯定地答：『是，是！』訪客走後，在座陪客都滿懷疑惑。其中有廣府人直言對孫先生說：『中山先生，您明明是廣府人，爲何說是客家人？』孫先生很和藹地對他們說：『我們都是中國人，而且在革命時期，要通力合作，他們說我是客家人乃指祖先是客家人。』他們聽了，啞口無言，由此也可見孫先生的偉大。」

從上述兩則引文，再加上前引羅香林在《客家研究導論》中所云「孫公父子，尚能客語，但他姊妹、和母妻，則只能操本地系白話了」，我們可知孫中山是諳客語的，只是翠亨孫氏家族是已然廣東當地語系化的客家人，所以家族內部平常慣以廣東本地白話交談。

綜上所述，筆者認爲一者，即便是「東莞說」也不能否認孫中山是客家人，按「東莞說」所引用之東莞左坡《孫氏族譜》，孫氏一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遷徙路線是江西寧都→廣東南雄→東莞→香山；[20] 首先，位於贛南的寧都是說客家話的。而接下來的南雄，據羅香林的考察，幾乎全鄉都是客家。（羅香林，1992：116）所以即使孫氏後來遷至非客家村的翠亨村，也只是反映出孫氏族在遷徙過程中逐漸被廣東當地語系化，在文化上沒有維繫太多的客家色彩，但孫氏族的血統本是客家，應是無疑的。二者，筆者認爲在定義一個人是否爲客家，其自身的認同是一個關鍵性的因素。按上文的敍述，孫中山自承其祖先爲客家人，所以他自己也是客家人。亦即他對自己的客家身份是認同的。只是作爲中華民族歷史上的第一個共和民主政體的開創者，孫中山的胸襟已超越了狹窄的客家族群意識，而將自身置於大中國的漢人體系裡，爲全體中國人謀福利。三者，與對他具有啓蒙作用的天王洪秀全相比，儘管兩個人所推動的革命都不能算是客家運動，而是置於中國漢人框架中裡的政治運動，然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國後，卻讓其政體的架構太過侷限在客家的色彩中，影響所及，官制、社會制度及政策等都無法開展，最終導致覆滅。客家身份對於孫中山而言，卻是襄助他革命成功的有利資產，有助於他拉攏同志情感（遇到客家人革命黨員，可用客語交談），而其寬廣的胸襟，大約也與其孫氏族是客家和廣東本地通婚融合的家庭有關。客廣融合的孫氏族與本地人相處融洽，此環境亦有助於孫中山的族群意識是廣泛的中國漢族意識，而沒有停留在因客土衝突而激化的狹隘客家意識上。

[20] 不著撰人。〈孫中山不是廣府人？不是客家人？是潮州人？〉。http://bbs.southcn.com/archiver/tid-472306.html。2009/11/19 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辛亥革命時期的客家革命團體、革命學堂及革命活動

(一) 黃興與華興會

黃興（1874～1916），字克強，湖南省長沙府善化縣高塘鄉人。按照《經鏗黃氏族譜》所載：

> （湖南善化）經鏗黃氏爲黃庭堅之後，世居江西泰和縣鵝頸大邱。元末明初，因長期戰亂，兩湖地區土地荒蕪，人口銳減，明政府遷江西人口充湖南。黃氏有國璋者，字髦士，洪武初年攜家西徙湖湘，居長沙市對江瀠灣，後裔遂爲善化黃氏。爲別於其他異支同姓，自稱經鏗黃氏。（黃沄、黃錫燾等，2006：開頭頁）

善化經鏗黃氏從開基祖黃國璋起，傳至第十七世黃維德，即爲黃興的祖父。黃維德有三子，幼子黃式翥，號筱村，即爲黃興之父。黃筱村爲當地著名秀才，只因黃家祖訓要求後代不得爲清代之官，所以一直都在鄉教書，兼辦團練。當由於其教導有方，故頗累積了一些田產，黃家在當地堪稱富饒。（劉強倫，2006：6-7；蕭致治，2005：8）

在上述的資料中，有幾個地方頗值得我們玩味和深究的。第一，黃興家屬湖南善化黃氏，而善化黃氏（就是經鏗黃氏）不是本地湖南人，是從江西泰和縣遷來的。第二，善化經鏗黃氏是黃庭堅的後代。位於贛南的泰和，羅香林將之歸爲非純客區，（羅香林，1992：94）但所謂「非純客」，就表示那個地區有客家人散居其間。實際上，贛南地區最早爲客家人從北方南遷時的第一站。[21] 不過江西泰和的黃

[21] 張如山。〈上杭客家與江西的親緣關係〉。http://big51.chinataiwan.org/zppd/YJCG/200911/t20091127_1155938.htm。2010/10/14 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氏是從哪裡遷來呢？根據《江西修水分寧雙井族譜》，黃庭堅一族是在第二十七世黃圮從浙江金華婺源遷至分寧的，[22] 黃庭堅爲黃圮的七世孫，而黃圮八世孫黃訓再從分寧遷至泰和。[23] 綜上所述，黃氏從北方南遷至湖南善化的遷移軌跡大約爲：浙江金華→江西分寧→江西泰和→湖南善化。從善化經鏗黃氏的遷移軌跡，再加上善化黃氏一直到黃興之父一代都仍保有耕讀傳統，我們可推論黃興家族是客家人。

黃興幼年深受王夫之思想之薰陶。生活在明末清初、正當時代巨變之刻的王夫之，其思想中特別強調「華夷之辨」，[24] 黃興日後同情維新運動，認同變法主張，應與此有關。1902 年，黃興被派赴日留學，抵日不久即和蔡鍔、楊篤生等創辦了《遊學譯編》，並組織「湖南編輯社」，介紹西方的文化科學。1903 年，黃興返回中國，在暗中籌劃革命。他先在上海認識了《蘇報》主編章士釗等新派人士，隨後受先前留學日本東京弘文學院的長沙明德學堂校長胡元倓的邀請，回長沙明德學堂任教。黃興在明德學堂創辦了名爲「東文講習所」的日語學校，並翻印了大量革命人士的書籍，如鄒容（1885-1905，四川巴縣人，原籍廣東嘉應，爲清代「實川遷移」去巴縣的客家人）的《革命軍》、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鐘》等。但此舉遭到一些

22 不著撰人。〈江西修水分寧雙井黃氏族譜〉。http://ihuang.org/a4-036-04-0001.htm。2010/10/14 檢索。但根據《姓氏與黃姓源流考》中之〈黃氏世系譜〉和黃基正編之《黃氏家譜》，黃氏自一世祖黃高起幾歷遷移，至第七十三世祖黃志遷居至福建邵武；又至第八十八世祖黃肅，生四子，次子二郎分居江西嘉禾，後移湖廣白沙金華，爲庭堅公之祖。（黃阿新，1965：363-364；黃基正，1965：44）

23 不著撰人。〈江西修水分寧雙井黃氏族譜〉。http://ihuang.org/a4-036-04-0001.htm。2010/10/14 檢索。

24 不著撰人。〈王夫之與長沙〉。http://www.changsha.cn/infomation/rlwhzdu/t20030808_1197.htm。2010/10/14 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保守人士的控告，雖然明德學堂的董事龍璋等人爲其擔保解圍，然此時的黃興已然決心投筆從戎，投入革命。爲使學堂不致受到牽連，他毅然辭去教職，然後變賣長沙老家的祖屋及農田以籌集資金。

1903 年 11 月 4 日，黃興以慶祝三十壽辰（虛歲）爲名，邀請章士釗、彭淵恂、劉揆一、柳大任叔侄、宋教仁、周震霖、徐佛蘇、胡瑛、翁鞏、秦毓鎏等共 12 人，在長沙保甲局巷的彭淵恂家集會，商議籌設革命團體。會上決定以「興辦礦業」爲名，對外聲稱成立「華興公司」，入會者均稱入股，「股票」即會員證，並以「同心撲滿、當面算清」爲口號，隱含「撲滅滿清」之意，此亦反映出華興會從一開始就決定以「武裝革命」作爲手段。1904 年除夕（2 月 15 日）於長沙龍璋的西園寓所，正式成立華興會。黃興被推舉爲會長，宋教仁、劉揆一爲副會長，確定了「雄踞一省，與各省紛起」的戰略方針，以「驅逐韃虜，復興中華」爲口號。

華興會成立不久，即發展到五、六百人的規模，參加者多爲留日或本地的知識份子。此外，黃興更成功聯合了湖南哥老會的首領─馬福益，共同籌劃於該年（1904 年）11 月慈禧七十壽辰時起事，並公推由黃興出任主帥，劉揆一與馬福益爲副帥。然而謀劃起事的消息提早敗露，10 月時即爲清廷所追捕。黃興逃至日本，馬福益則走避湘西，後於隔年再度謀劃起事時被捕，從容就義。華興會的行動至此終止。[25]

(二) 鄭士良與三合會

鄭士良（1863～1901），別號弼臣，廣東歸善（惠陽）客家人。歸善鄭氏的先世系出河南滎陽。（韓志遠，2001：176）早年即加入

25 不著撰人。〈黃興與華興會〉。http://www.changsha.cn/infomation/rllsfy/t20030808_1572.htm。2010/10/14 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洪門系統的三合會，爲三合會之地方首領。

孫中山在廣州博濟醫校念書時結識了三合會的鄭士良，之後鄭士良便一路支持孫中山革命，包括在 1895 年孫中山回香港籌組興中會分會時加入該會；以及 1900 年八國聯軍之際，奉孫中山之命率領三合會眾於惠州三洲田（今深圳鹽田三洲田村）發動惠州起義。（詳細討論請見後文第四章第二節）

(三) 同盟會的外圍團體

1. 二李與聯志社

1905 年，李自重、李是男等在新寧創立了新寧聯志社；該社先以黃少泉的「仁安藥房」爲活動機關以連絡革命志士，宣傳革命，爲同盟會的外圍團體，後來社員多半加入同盟會。李自重與李是男皆爲廣東新寧（臺山）客家人，其先世均系出隴西的李唐後代，後輾轉遷至新寧。（韓志遠，2001：176）

李自重（1882～?）與其父親李煜堂後來都是孫中山的忠誠追隨者；而李自重早在成立聯志社前，即於 1901 年在日本與馮自由一同組織廣東獨立協會；1903 年進入孫中山所創立的第一所革命軍事學校－東京的青山軍事學校學習軍事；辛亥廣東光復後，嘗與李海雲在新寧城起義。

李是男（1886～1937）出生於美國，後來擔任美洲同盟會會長，成爲孫中山在美國的得力募款助手，辛亥革命成功後，被派爲廣東臨時總統府之秘書。

2. 謝逸橋的松口體育會

1905 年，謝逸橋和饒芙裳等設立「松口師範傳習所」，後又於 1907 年與溫靖侯（廣東嘉應客家人）、姚雨平（1882～1974，廣東平遠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家人）等創辦「松口體育會」，先後吸納了會員二十餘人。松口體育會的師生後來大量參與在廣東地區發動的起義，尤其是黃花崗起義，有三十餘人參加，其中周增（?～1911，廣東嘉應客家人）、饒輔廷（1880～1911，廣東嘉應客家人）、林修明（?～1911，廣東蕉嶺客家人）三人成爲烈士。（徐輝琪，2001：136）謝逸橋（1874～1926）原名謝元驥，逸橋爲其字，廣東嘉應州松口人。饒芙裳（1856～1941）與謝逸橋爲同鄉，兩人都是客家人。饒氏爲廣東名儒，本身也是書法家，其與謝的父親謝可齋爲忘年交。當饒氏因爲孫中山的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而流亡至馬來西亞的檳榔嶼時，謝可齋即資助他在當地成立中文學校，以培育革命人才。後來也把謝逸橋送入該校就讀。[26] 謝逸橋原本贊同的是康有維等的維新運動，但在檳榔嶼時遇見了逃去該地的興中會會員程璧光，始知有孫中山革命，當即滿腔熱血無可扼抑，1900 年，與其弟謝良牧（即謝元譽，字敬野，1883-1931）一同赴香港拜見孫中山，聲言要加入興中會。[27] 後 1905 年，兄弟二人赴日本，加入同盟會，成爲同盟會首批會員。謝逸橋亦爲嶺東同盟會的主盟人（後文還會詳述謝氏兄弟在同盟會時期大力支持孫中山革命的事蹟）。

3. 饒芙裳與松口公學

上文雖已略爲談到饒芙裳，然而關於饒芙裳，仍然頗有些事蹟值得一書。饒芙裳在檳榔嶼時，遇到了戴芷汀。戴芷汀（1871～1938）爲清朝最後一位南洋總領事戴欣然（名春榮，字喜雲）之子；戴家爲

---

26 饒藹基。〈辛亥革命功臣－饒芙裳先生〉。http://www.qxyb.meizhou.net/200703/kjxy02.htm。2009/11/24 檢索。

27 不著撰人。〈愛國華僑謝逸橋、謝良牧兄弟〔梅縣〕〉。http://www.cnhakka.com/BBS/read-htm-tid-648-fpage-4.html。2009/11/24 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廣東大埔客家人，戴欣然於 1872 年身無分文地從大埔來檳榔嶼謀生，後來因緣際會，成爲檳榔嶼的富商，並當上滿清的南洋總領事。戴欣然雖名爲清朝之官，但對革命黨在檳榔嶼的活動卻是包容的，饒芙裳在檳榔嶼辦學，也是在他的默許下進行。至於戴芷汀，曾以一個客家人出任清代的福建泉州知府，且政績優良，後來在回鄉時於極樂寺偶遇饒芙裳。饒芙裳建議他興學以作育救國之英才。結果，一所本地客家人的學堂─崇華學堂（現在時中學校的前身）就此誕生。[28]在「三・二九」黃花崗之役中殉難的羅仲霍（1882～1911，廣東惠陽客家人）即曾在該校任教。

而 1905 年春，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前幾個月，饒芙裳在松口召集各村紳耆，成立「松口興學會」，並將原先的梅東書院改建爲新式的高等小學堂，命名爲「松口公學」；1911 年，同盟會粵東主盟溫靖侯任校長後，吸收了大批師生爲會員，並帶領松口同盟會員參加廣州「三・二九」武裝起義。松口公學可謂辛亥革命的革命搖籃之一。[29]

4. 丘逢甲與嶺東同文學堂

丘逢甲（1864～1912）爲臺灣苗栗縣銅鑼人，然祖籍爲廣東嘉應州鎮平縣，爲客家人。當其在台抗日失敗後，即舉家遷回祖居地鎮平縣。丘逢甲在鎮平反思抗日護台的失利原因，大抵歸因於人民缺乏堅定的愛國革命思想，故決心創辦新式學堂，啓迪民智。1900 年，丘逢甲與溫仲和（1849～1904，廣東嘉應客家人）於汕頭創辦嶺東同文學堂，溫爲總教習，他則自任監督。該學堂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

---

28 王琛發。〈戴氏家族與「五層樓」〉。http://www.penangmedia.com/cms/lishi/2007/0909/article_59.html。2009/11/24 檢索。

29 不著撰人。〈梅縣松口中學走過百年歷程成爲省一級學校〉。 http://www.meizhou.gov.cn/zwgk/zwdt/mzyw/2006-12-22/1166770164d8585.html。2009/11/24 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方式教授學生。（賴曉萍，2002：30-32）嶺東同文學堂後來也成爲培育革命志士的搖籃。[30]

5. 洪全福與「大明順天國」事件

洪全福（1836～1910），原名春魁，字梅生，一字其元，洪秀全從姪，（馮自由，1954：118）[31] 故亦爲客家人。在太平天國時期被封爲瑛王。太平天國覆滅後，更名全福，逃至東莞鳳崗鎮的洪屋圍村隱姓埋名，後又逃至香港。曾簽約爲苦力以及當過洋輪廚師，在行船期間認識孫中山，曾爲其運輸武器，支持革命。[32] 最後加入洪門，成爲洪門的一個首領。1901 年 8 月，率洪門會黨眾與興中會創會會員謝纘泰（1872～1939，廣東開平客家人）合議舉事，獲李紀堂（1873～1943，廣東新會客家人）慷慨資助五十萬，自稱「大明順天國南粵興漢大將軍」，約定於 1903 年 1 月舉事。可惜未發難即事洩失敗。

伍、孫中山在中國革命運動中之客家關係

一、孫中山與革命黨：以興中會和同盟會爲例

(一) 興中會（1894～1905）

1893 年冬，孫中山曾召集鄭士良、尤列、陸皓東等在廣州廣雅書局內南園抗風軒開會，商議建立一個革命組織，但未有具體結果。

30 可見後文「同盟會」部分的敘述。

31 不過陳春生言：根據興中會各同志革命工作史略，其應爲洪秀全之第三弟。（陳春生，1957：315）

32 不著撰人。〈鳳崗先賢列傳〉。http://www.fenggang.gov.cn/fenggang/ShowArticle.asp?ArticleID=20。2009/11/30 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隔年（1894）秋，孫中山赴檀香山，決心組建革命團體，得到當地華僑數十人的支援。於是在 11 月 24 日假卑涉銀行（Bank of Bishop and Co., Ltd.）華經理何寬宅（但後因場地狹，遂改至李昌家中舉行）舉行革命團體成立會，出席者共 25 人。會議由孫中山主持，提議團體定名爲興中會，會中並訂立章程，選舉永和泰商號經理劉祥、何寬爲本會正副主席，黃華恢爲管庫，程蔚南、許直臣爲正副文案，鄧蔭南等爲值理。（張玉法，1975：159-160）入會者填寫盟書，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爲誓詞。會後相繼加入者有九十餘人。

當我們回溯檀香山興中會的成立過程，會發現客家僑民在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首先要談到的是鍾木賢。鍾木賢是廣東五華縣客家人。早年赴檀香山當勞工，後來功成名就，孫中山能順利地在檀香山號召愛國志士，便是借重鍾木賢的威望與特殊背景。鍾木賢自己當然也是興中會的倡始人之一。尤有甚者，鍾木賢更在 1904 年介紹孫中山加入洪門客家團體——國安會。（戴興明，1988：38）

檀香山的第一批客家人是在 1876 年抵達檀香山的，他們主要是香港巴色會的基督徒。[33] 在此略談一下巴色會。香港的巴色會乃 1847 年、由巴色傳道會（Basel Mission）所派來的瑞典傳教士韓山明牧師 (Rev. Theodore Hamberg）與德國傳教士黎力基牧師（Rev. Rudolph Lechler）創立。其中韓山明（又譯韓山文，即前述《太平天國起義記》之作者）負責向廣東的客語區傳教；黎立基則向潮汕區傳教。然而黎立基後來遭潮汕人所逐，故二人與後來來華的巴色會傳教士韋永福（Philipp Winnes）合力專向客家人傳教。（李志綱，1994：243-244）由此可知，巴色會的信徒應該絕大多數是客家人。而在興中會創會會

33 范純。〈夏威夷的第一個中國教會〉。http://www.hawaiichinesenews.net/hawaiinews/hcn030916/fccc.html。2010/10/14 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員的名單中，有幾位正是巴色會信徒，所以他們也一定是客家人，如鄧蔭南、何寬、李昌（香港巴色會第一位客家籍牧師）、鍾宇等。[34]

再來檢視以下 24 位興中會創會會員名單：

表 1　興中會創會會員名單

何　寬（廣東香山）	李　昌（廣東香山）	劉　祥（廣東臺山）
程蔚南（廣東香山）	鄧蔭南（廣東開平）	鄭　金（廣東寶安）
黃　亮（廣東香山）	黃華恢（廣東南海）	鍾木賢（廣東五華）
許直臣（廣東香山）	卓　海（廣東香山）	李　祿（廣東香山）
李多馬（廣東寶安）	林鑒泉（廣東香山）	鄭　照（廣東寶安）
劉　壽（廣東新寧）	鍾（工）宇（廣東香山）	曹　采（廣東香山）
劉　卓（廣東香山）	宋居仁（廣東香山）	陳　南（廣東香山）
夏百子（廣東香山）	李　杞（廣東香山）	侯艾泉（廣東香山）

資料來源：馮自由，1977：88。

有人說這份名單裡幾乎全是客家人。關於此點，筆者仍需一一考察。

然而檀香山興中會的這些客家會員，有許多後來都被梁啓超（廣東省新會縣客家人）（邱濤，2001：219-221）的保皇黨所吸收。（馮自由，1969a：13）因此，1895 年 2 月 21 日，孫中山在香港重新聯合其舊友陳少白、楊鶴齡、尤列、陸皓東、鄭士良、程奎光等，並與楊衢雲、謝纘泰的輔仁文社合併，成立興中會總會，由楊衢雲任會長，對外以「乾亨行」爲名；至於檀香山的會只爲支會。孫中山的十一次起義中，前兩次－廣州起役和惠州起役，即在興中會時期發起，然而

[34] 梁壽華。〈中國革命與基督教信仰〉。http://life.fhl.net/FHL/M.873858224.A.dir/M.873807900.A.htm。2009/11/22 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皆以失敗告終。1905 年 7 月 30 日，興中會與黃興的華興會合併爲同盟會。

(二) 同盟會（1905～1911）

1905 年 6 月 28 日，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召集同盟會第一次籌備會議，其口號爲「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設民國，平均地權」。同盟會打從成立之初，即受到客籍留日學生的積極支持。儘管對在籌備會議當天入會的人數各家說法不一，（張玉法，1975：308）但從中約略可以整理出的客籍志士共有 29 位，名單如下：（張興漢，1994：842）

表 2　同盟會創會客籍志士名單

謝良牧（廣東嘉應）	古應芬（廣東番禺）	黃超如（廣東嘉應）	何天炯（廣東興寧）
胡毅生（廣東番禺）	謝逸橋（廣東嘉應）	何天翰（廣東興寧）	梁慕光（廣東歸善）
李　勒（廣東嘉應）	梁揆通（廣東嘉應）	謝延惠（廣東嘉應）	謝延祉（廣東嘉應）
溫靖侯（廣東嘉應）	饒一梅（廣東嘉應）	何卓麟（廣東大埔）	劉維濂（廣東興寧）
劉群立（廣東興寧）	李定區（廣東興寧）	李蔭區（廣東興寧）	李敬熙（廣東興寧）
胡漢民（廣東番禺）	廖仲愷（廣東歸善）	梁筮圃（廣東嘉應）	李天麟（廣東嘉應）
陳志凱（廣東嘉應）	張仁任（廣東嘉應）	李華偉（廣東嘉應）	饒景華（廣東興寧）
何　成（廣東興寧）			

資料來源：張興漢，1994：842。

在這 29 個人之中，何天炯、謝逸橋、謝良牧兄弟、何天翰、饒一梅等都是前文所提之嶺東同文學堂的學生。

而根據何天炯所保存之《中國同盟會成立初期（乙巳丙午兩年）之會員名冊》，在同盟會創立的 1905 年，總共有 48 位客籍人士入會。再根據馮自由《中國同盟會最初三年會員人名冊》，到了 1907 年時，總共有 50 位客家志士入會。同盟會成立之後，客家志士仍陸續紛紛加入。關於客家與辛亥革命的關係，徐輝琪已作了相當詳細的討論，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下即簡要說明。（徐輝琪，2001：135-138）

1. 許多客籍人士在同盟會裡擔任重要職務

表 3　同盟會任重要職務客籍人士名單

執行部（下設六部）	外務部：廖仲愷
	書記部：胡漢民→李肇甫（四川巴縣客家人）
	會計部：劉維濂→謝良牧→何天炯→廖仲愷
司法部	何天瀚
評議部	吳永珊（四川榮縣客家人）、梁慕光、胡漢民
四川省主盟人	李肇甫、吳永珊
天津主盟人	廖仲愷
廣東省主盟人	何天瀚→何天炯→廖仲愷→熊樾山→何天衢

資料來源：徐輝琪，2001：135。

其中廖仲愷（1877～1925）是位尤其出色的人物。從上表可知他不但出任同盟會總部的多項工作，還擔任天津與廣東省主盟人，並積極發展同盟會員。（徐輝琪，2001：137）

2. 致力於發展同盟會海外組織

(1) 南洋荷屬各埠同盟會：同盟會本部派謝良牧、李柱中、李天麟、陳方度、曾連慶等人組成，對外多稱書報社或學堂。（張玉法，1975：326）

(2) 緬甸中國同盟會：嘉應州幫有 10 人。（徐輝琪，2001：136）

(3) 新加坡同盟會：因會員眾多，不能開全體大會，乃分爲福、潮、客、廣等幫，每幫舉代表一人，傳達會務。（張玉法，1975：325）此即說明客籍人士占了不小比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 辦報宣傳革命

(1) 廖仲愷先後在《民報》上發表九篇譯作和論文，介紹民主革命思想。而另一位經常在《民報》上撰稿的客家人士則爲 1907 年加入同盟會的劉春海（?～1984，福建寧化客家人）。

(2) 吳永珊一方面爲《民報》募款，另一方面則於 1907 年創辦《四川》雜誌宣傳革命。

(3) 張杜鵑（1874～1943，廣東興寧客家人），在新加坡遇見孫中山後加入同盟會，曾任新加坡《興中報》、《南洋日報》等主筆，積極鼓吹革命。

(4) 謝英伯（1886～?，廣東嘉應客家人），年少時在香港讀書，深受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曾爲香港暗殺團十二員中之一。後又加入同盟會，成爲香港主盟人。此外自己還成立一個民生書報社宣傳革命。二十一歲即任《亞洲日報》總編輯，此後又任職於《中國日報》和《少年中國報》，經常在報上宣傳同盟會的革命主張，也經常與康、梁的維新保皇派人士筆戰。[35]

(5) 張懷真（1871～1941，廣東嘉應客家人），1906 年入同盟會，1907 年在汕頭與葉楚傖等人創辦《中華新報》，任總主筆，葉楚傖主任總編輯，後葉離任，由張懷真兼任總編輯。其以辦報爲工具「不遺餘力宣傳孫中山的革命思想」，遭政府當局一再將其報社封閉。但他屢次更換報名，由《中華新報》改成《大風報》、《新嶺東報》、《平報》、乃

35 謝哲幫。〈謝英伯的一點史料〉。 http://www.gzzxws.gov.cn/gzws/cg/cgml/cg4/200809/t20080909_6991_2.htm。2009/11/26 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至《汕報》，先後被捕三次，均因激起民憤而獲釋。時人稱其爲「報界之宗」。

(6) 曾伯謍，1905 年入同盟會。1907 年冬，與鍾動、李季子、曾晚歸、古直（1885～1959，廣東嘉應客家人）等組織「冷圃學社」，以「冰雪萬里，潛孕陽春」爲宗旨，傳播革命救國思想。[36]

(7) 鄒魯（1885～1954，廣東大埔客家人），1905 年入同盟會，原本一直投身於武裝起義。1911 年籌備黃花崗起義時，創辦《可報》，大肆鼓吹革命。

二、革命戰役：惠州起義與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孫中山在辛亥武昌起義成功前，主要經歷了十次起義。儘管這十次起義皆功敗垂成，但革命志士們爲理想赴湯蹈火、視死如歸的精神，是現代中國歷史上一幅悲壯卻生氣勃勃的畫面。孫中山革命黨中佔據高比例的客家志士，自是無法在其中缺席。由於十一次起義中，有六次選在廣東起事（其中三次在廣州，兩次在惠州，一次在潮州）。因此我們首先需要探討的是─孫中山爲何特別青睞廣東省作爲其革命起義之重鎮？

早在第一次起義─廣州乙未革命前，孫中山即主張「襲取廣州以爲根據」。（孫中山，1981b：230）失利後，他仍主張「攻取粵桂滇三省爲革命根據地」，（馮自由，1969b：118）其中尤以「廣東爲最善」。（韓志遠，2001：182）

其原因大約可以歸納成以下三點：

1. 孫中山本身是廣東人，廣東是其人脈建立之處，對於其號召革

[36] 不著撰人。〈古直年譜述要〉（之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56a61701009b61.html。2010/10/14 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命較爲容易與方便。孫中山曾在與日本友人宮崎寅藏筆談中談及：「蓋起點之地，不拘形勢，總求急於聚人，利於接濟，快於進取而矣。」又「萬端仍以聚人爲第一者，故別處雖有形勢，雖便於接濟，而心不能捨廣東者，則以吾人之所在也。」而「在廣地，一月之內必可集山林剽悍之徒三、四十萬。」（孫中山，1981a：183）關於上述「吾人」的定義，有許多種說法與猜測，但筆者贊成韓志遠所提：「孫中山謂之『吾人』，乃以客家人爲主體的廣東人。」（韓志遠，2001：185）

關於孫中山在廣東的人脈，胡漢民（1981：160、172）曾說：「先生（孫中山）自爲醫，於省澳之間，已以能惠恤貧人苦力稱。」)在結交「下流社會」的同時，孫中山與許多廣東富商或華僑相善，其革命資金常來自於這些商人的贊助。由此可見，孫中山在廣東一地早已建立了穩固的人脈基礎。

而在此我所要強調的是，孫中山身爲廣東客家人，同盟會中的許多志士也是客家人，他以廣東省作爲革命的發生地，用意正在於廣東是客家人的地盤，這也是他獨鍾廣東的最大原因。

2. 廣東省地處南方邊陲，離京城甚遠，故中央政府對之鞭長莫及，而地方政府管理鬆懈。又廣東鄰海，且與港、澳接近，不但與國外接觸連絡容易，倘若起義失敗，亦能迅速地至港、澳避難。
3. 廣東經濟情況良好，可以在物資上支援革命。

下表即就在廣東發生的六次起義作一簡單之分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4　孫中山於廣東之六次起義表

時　　間	起 義 名 稱	經　　過	參與之客籍人士
1895 年 10 月 26 日	廣州起義（乙未廣州之役）	孫中山領導的第一次起義。因消息洩露，所購槍械在廣州碼頭被繳，四十多人當場被捕，陸皓東等人犧牲，孫中山流亡海外。	陸皓東
1900 年 10 月 8 日	惠州起義（庚子惠州之役）	由鄭士良、黃福等發動，起義隊伍發展到兩萬人，因在日本所購武器被日方扣存於臺灣而告失敗。鄭士良犧牲，一萬多人流亡海外。此乃孫中山領導的第二次起義。	鄭士良
1907 年 5 月 22 日	潮州黃崗起義	余既成、陳湧波等在潮州黃岡起義，月底失敗。此乃孫中山領導的第三次起義。	謝逸橋、謝良牧、姚雨平、溫靖侯、丘哲、溫翀遠
1907 年 6 月 2 日	惠州七女湖起義	鄧子瑜等在惠州七女湖起義，13 日失敗。此乃孫中山領導的第四次起義。	
1910 年 2 月 12 日	廣州新軍起義	倪映典率新軍在廣州起義，次日失敗，倪映典犧牲。此乃孫中山領導的第九次起義。	姚雨平、羅熾楊、李濟民、林震、劉灝、鄒魯、鄧鏗、林修明、丘哲、張杜鵑、何子衡、馬雄韜、鄧醁、鄧拔、鄧挺等
1911 年 4 月 27 日（陰曆 3 月 29 日）	廣州黃花崗起義	黃興率部在廣州起義，當日失敗，犧牲 86 人，由潘達微收得烈士遺骸 72 人葬於紅花崗，後改名爲黃花崗。這是孫中山領導的第十次起義。	86 烈士中有 34 個爲客家人

資料來源：韓志遠，2001：18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中尤以惠州和「三・二九」黃花崗兩個起義有非常多客家志士參與其中。以下試述之。

(一) 惠州起義（1900 年 10 月 8 日）[37]

在論客家與惠州起義間的關係前，筆者想先討論一下惠州起義作爲孫中山革命運動中的第二次戰役，所具有之特殊意義。周興梁曾對此作過詳細的論述，其所提出的其中兩個特點爲：(1) 惠州起義是孫中山力圖以武裝革命手段，來實現其民主共和國理想的最早嘗試；(2) 惠州起義之主要依靠力量是會黨和綠林。

關於第一點，周興梁援引文獻來說明孫中山在許多場合中都表明其欲以武力革命先在華南地區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的意圖，而華南地區的廣東則是其起義的首選之地。其原因可見諸前文之分析。

而周興梁所分析之惠州起義的第二個特點乃依靠會黨和綠林甚多。孫中山對於連絡會黨以從事革命這點是早已思考過的，他曾說：「乙酉以後，余所持革命主義，能相喻者，不過親友數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於功名利祿，唯所稱下流社會，反有三合會之組織，寓反清復明之思想於其中。雖時代湮遠，幾於數典忘祖，然苟與之言，猶較縉紳爲易入，故余先從聯絡會黨入手。」（孫中山，1981c：63）而辛亥時期的會黨又以廣東一地爲最盛，「在廣地，一月之內必可集山林剽悍之徒三、四十萬。」（孫中山，1981a：183）在會黨和綠林中，客家人佔了很大部分；羅香林即云：「客家人富民族思想，其子弟之出而參加天地會等反清團體的，至是亦日益眾多。」（羅香林，1992：250）屬於天地會洪門系統的三合會，當然是孫中山想要積極連絡的

---

[37] 關於惠州起義的時間，歷來有 10 月 5 日、6 日、8 日三種記載，詳情請參見周興梁。〈孫中山庚子惠州起義的性質和特點〉。http://jds.cass.cn/Article/20080515110556.asp。2010/10/14 檢索。本文取孫中山的說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力量。1898 年，孫中山在同宮崎寅藏談話時指出：「這起義必須有三合會的支援，只要跟三合會取得聯絡，便可成立近乎完整的革命軍。」（郝盛潮（主編），1994：9）而在惠州起義發生前兩年，即 1898 年，廣西李立亭即率領三合會數千人起義，這數千人中，許多就是廣西陸川的客家人。李立亭的起義還吸引了興中會的三個成員（宋居仁、鄧蔭南、尤列）意欲前赴加入。

如前文所言，惠州起義的總指揮鄭士良，本身既是廣東歸善客家人，也是三合會首領，其所率領起事的主要是廣東客家地區如惠州與嘉應州一帶的三合會會眾、及新安縣的綠林，所以可推測幾爲客家人。而除了真正參與起義的人外，從旁在經濟上給予支援和協助進行者，仍然看得到客家同志的身影，以下簡述之：

1. 黃福（?～1903），本名黃遠香，廣東新安縣龍華鄉客家人。早年即參加三合會，爲「三合會領袖中最得人望」者。鄭士良爲確保把分散的三合會員組織起來，在起義前特地把他從南洋婆羅洲請回來。他一回來後，果然「各處黨號的草鞋都會圍集攏來，只要黃福發一個命令，真是如響斯應，無不唯唯照辦的」。（孫中山，1981c：67）
2. 梁慕光，廣東博羅客家人，商人出身，爲興中會員，也是博羅等地三合會首領，在三洲田起義中擔任博羅的起義軍首領。之後也曾參加洪全福的大明順天國革命。後來也是同盟會成立的首批會員之一。[38]
3. 黃耀庭（1872～?），廣東新安縣沙頭鄉客家人，[39]爲廣州、

[38] 彭全民。〈三洲田起義組織者〉。http://sso.sz.gov.cn/pub/szzx2008/wsl/szws/4/200602/t20060224_976872.htm。2010/9/4 檢索。

[39] 劉乃哲。〈黃耀庭傳奇〉。http://sso.sz.gov.cn/pub/szzx2008/wsl/szws/4/200602/t20060224_976866.htm。2010/9/4 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惠州一帶洪門首領之一。1900 年在新加坡加入興中會。後隨黃福回鄉，任三洲田起義軍的先鋒官。1905 年，黃耀庭與孫中山、以及楚楠、林義順、鄧子瑜等 12 人在新加坡晚晴園成立同盟分會。[40]

4. 鄧子瑜，廣東省歸善客家人，商人出身，爲興中會員，也是惠州三合會首領。在三洲田起義時擔任鄭士良之左右手。
5. 李紀堂（1874～1943），名柏，紀堂乃其號，廣東新會七堡衝歷村客家人。紀堂出身於富商之家，1900 年在謝纘泰的介紹下加入興中會，從此慷慨疏財，投身革命。在惠州起義籌劃時期任駐港會計主任，並捐二萬元作爲經費。（馮自由，1969a：138）[41]

至於起義地點——三洲田，位於現在深圳龍崗區和鹽田區交接處，「該地有禾塘崗、田下圍、老圍、大屋等七個自然村，居民有黃、林、鍾、廖等七姓，是以耕種和漁獵爲生的客家人。」參加惠州起義的三洲田客家人有廖官秀、廖雲秀、廖金姐、廖建坤、廖三、廖觀嬌、方官壽等，他們共同召募了 1,000 多人，後來黃福帶著這批義士在龍崗地區旗開得勝，殲滅清軍數 10 人。然由於鄭士良接獲孫中山「若能突出，可直越廈門」的電令，於是率軍往廈門去，行至惠陽新圩時，當地客家人踴躍參加，隊伍增至 2,000 多人。等到 10 月 24 日起義軍到達惠陽客家地區三多祝白沙時，隊伍已發展到兩萬多人，其中依舊不少是客家人。[42]

---

40 彭全民。〈三洲田起義組織者〉。http://sso.sz.gov.cn/pub/szzx2008/wsl/szws/4/200602/t20060224_976872.htm。2010/9/4 檢索。

41 又 1909 年孫中山在致吳敬恆的信中自云：「庚子惠州起兵及他方經營，接濟所費，不下十餘萬元，所得助者祇香港李君出二萬餘元，及一日本義俠出五千元，其餘則我一人之籌獲而來也。」（孫中山，1957：83）

42 不著撰人。〈深圳龍崗三洲田起義，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第一面武裝起義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三・二九」黃花崗起義

徐輝琪（2001：145-151）曾對於客家志士在黃花崗起義中所扮演的角色作過深入討論，大抵客家人在黃花崗起義前的重大貢獻可以分成以下幾部分：

1. 募款

(1) 謝良牧赴荷屬各埠發動當地同盟會員和書報社募款，與他同時在荷屬各埠募款的客籍志士還包括：姚雨平、曾伯謣、古亮初、梁紐若、吳偉康、李篤彬、黃甲元、伍連忠、溫慶武、劉芷芬等。
(2) 梁密庵「毅然將其父儲存鉅款，私自寄回國內支援革命」。
(3) 1909 年 8 月，客家志士梁鳴九、溫翀遠、廖介和、余意君等赴南洋籌款，募得數量可觀之捐款，由梁密庵匯寄至香港，再由梁鳴九親持匯票回港領取。結果梁鳴九所搭的郵輪不幸沈船，梁鳴九獻出寶貴的生命。

2. 在統籌部擔任重要職務

(1) 黃興爲正部長
(2) 姚雨平爲調度課長
(3) 羅織楊擔任調查課長

3. 主持為起義而設的秘密據點

在廣州所設立的 38 處秘密據點中，由客家人主持的共有 8 處：

旗幟〉。http://www.hakkaonline.com/forum/viewthread.php?tid=41656。2009/11/26 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 長堤嘉屬會館－姚雨平
(2) 謝恩里（軍隊接洽）－饒輔廷、吳雨蒼、廖叔唐
(3) 第七甫《可報》（宣傳並藏械）－鄒魯
(4) 高第街瓷業公司（軍隊接洽）－郭典三、郭冠雄
(5) 天香街－謝良牧所組織之松口選鋒隊員
(6) 三眼井－周增
(7) 九眼井－王興中、葉挺芬
(8) 小南門 24 號－姚雨平
(9) 鄧鏗自願將其父所經營之米店設立爲秘密機關

4. 選鋒

擔任選鋒工作的 9 人中，客家志士有 3 位：姚雨平、何天炯、張醁村。

5. 密運與分發槍械

(1) 何天炯、吳永珊：由日本運回。
(2) 郭典三：「大智大勇利用各種手段」，完成黃興所指派給他的護送彈藥槍械的任務。
(3) 陳甫仁（陳文友）：運械至廣州，事洩被補，遭殘害。

6. 軍事部署

四路軍隊中，有兩路爲客家人（姚雨平和張醁村）所率領。

從上可知，在黃花崗起義中，從策劃到實際行動，客家人皆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而從在起義中犧牲的烈士名單中，我們更可看到客家人佔了相當大的比例。關於黃花崗烈士的人數，葬於黃花崗的有 72 人，稱「七十二烈士墓」。然實際上，後來經過民國 7 年、11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及 12 年的數次考察，烈士入碑的共有 85 位。但後來又確實殉難的還有至少 10 位。（陳雄，1957：12）以下列出 86 位的姓名籍貫：

表 5　黃花崗烈士姓名籍貫表

喻培倫（四川內江）	林　文（福建侯官）	宋玉琳（安徽懷遠）	林覺民（福建侯官）
方聲洞（福建閩縣）	*饒國樑（四川大足）	*李文甫（廣東東莞）	林尹民（福建閩侯）
*陳文褒（廣東大埔）	陳與燊（福建閩縣）	*羅仲霍（廣東惠陽）	龐　雄（廣東吳川）
李德山（廣西柳州）	陳可鈞（福建侯官）	*饒輔廷（廣東梅縣）	陳更新（福建侯官）
陳　才（廣東）	遊　壽（廣東南海）	*徐滿淩（廣東花縣）	黃鶴鳴（廣東南海）
韋雲卿（廣西永淳）	程　良（安徽懷遠）	*郭繼枚（廣東增城）	*勞　培（廣東開平）
李　晚（廣東雲浮）	李文楷（廣東清遠）	李炳輝（廣東肇慶）	余東雄（廣東南海）
*林修明（廣東蕉嶺）	劉六符（福建連江）	劉元棟（福建閩縣）	*李雁南（廣東開平）
*徐日培（廣東花縣）	*張學齡（廣東興寧）	羅　進（廣東南海）	馬　侶（廣東番禺）
*周　增（廣東梅縣）	石德寬（安徽壽縣）	馮超驤（福建延平）	羅　坤（廣東南海）
陳　春（廣東南海）	*陳甫仁（廣東興寧）	*陳　潮（廣東海豐）	杜鳳書（廣東南海）
秦　炳（四川廣安）	*周　華（廣東南海）	羅遇坤（廣東南海）	羅　聯（廣東南海）
*江繼復（廣東花縣）	*曾日全（廣東花縣）	韋統鈴（廣西平南）	韋統淮（廣西平南）
韋樹模（廣西平南）	韋榮初（廣西平南）	黃忠炳（福建連江）	王燦登（福建連江）
卓秋元（福建連江）	胡應昇（福建連江）	魏金龍（福建連江）	陳發炎（福建連江）
陳清疇（福建連江）	羅乃琳（福建連江）	林西惠（福建連江）	*徐培添（廣東花縣）
*徐進炤（廣東花縣）	徐國泰（江蘇邳縣）	華金元（江蘇）	阮德三（江蘇）
陳　福（廣東南海）	林盛初（廣西平南）	*徐廣滔（廣東花縣）	*徐臨端（廣東花縣）
*徐禮明（廣東花縣）	*徐熠成（廣東花縣）	*徐容九（廣東花縣）	*徐茂燎（廣東花縣）
*徐佩旒（廣東花縣）	*徐廉輝（廣東花縣）	*徐松根（廣東花縣）	*徐保生（廣東花縣）
*徐昭良（廣東花縣）	*徐應安（廣東花縣）	*嚴確廷（廣東惠州）	羅　幹（廣東南海）
張　潮（廣東順德）	*李祖恩（廣東翁源）		

資料來源：陳雄，1957：92-93。

說　　明：上表打星號者爲客籍人士，共 34 位。

三、革命軍：孫中山與黃埔軍校

1924 年 5 月，在蘇聯與共產黨的協助下，孫中山建立了黃埔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校。誠如周恩來所言，孫中山建立黃埔軍校是「軍事上失敗的結果」。（周恩來，2007：165）辛亥革命雖然成功，但民國成立後政權卻一直陷入野心家或軍閥之手，孫中山在多次嘗試拉攏軍閥以謀求和平未果後，終於痛定思痛，體認到若無自己的軍隊，恐怕很難維持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民主共和政體，於是決心創辦軍校，培養革命軍的軍隊，他說：「我們今天要開這個學校…就是要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重新來創造，要用這個學校內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金沖及（主編），1989：85）從建校到所招收的學生，客家人依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 建校

1924 年 5 月，黃埔軍校正式建立，孫中山本身兼任校總理，他任命蔣介石爲校長，廖仲愷爲國民黨駐軍校黨代表。客家人廖仲愷在整個建校過程中可謂重要推手。1923 年 11 月，孫中山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時決定把陸軍講武堂改爲國民革命軍軍官學校，任命由廖仲愷與當時蘇俄的駐中國代表鮑羅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共同籌建軍校。1924 年 1 月，孫中山主持召開以改組爲中心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立「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派蔣中正爲籌備委員會委員長。後又任命廖仲愷爲大元帥大本營秘書長，協助籌劃軍校開辦事宜；以及王柏齡、李濟深、沈應時、林振雄（1888～1964，廣東惠州，祖籍廣東興寧，客家人）、俞飛鵬、宋榮昌、張家瑞等人爲籌備委員。然而後來蔣中正因爲意見不和欲辭去委員長之職，葉劍英（1897～1986，廣東嘉應客家人）曾回憶此事道：「當黃埔軍校的校舍已快修好，上海正進行招生考試，廣州也進行招生的時候，有一天，蔣的英文秘書高登雲（應爲王登雲）突然召集籌備人員說：『蔣先生已決定黃埔軍校不辦了，籌備處馬上解散。』當場還宣佈了每個人發多少遣散費。那時，籌備處的人大多是蔣邀請來的，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了後便想散夥。可是我與鄧演達（1895～1931，廣東歸善客家人）堅決反對……。」（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1982：31-32）[43] 蔣中正辭職後，整個籌建任務落在廖仲愷身上。他一方面挽留欲隨蔣中正離職的籌備處的人；另一方面，則倚仗鄧演達、葉劍英和蘇聯顧問小組共同努力。黃埔軍校最後得以成功建校，廖仲愷堪稱居功厥偉。

此外，儘管黃埔軍校的籌備委員會中只有一個是客家人（林振雄），但之後廖仲愷所借重一起扛起籌備大任的葉劍英與鄧演達，也都是客家人。若說黃埔軍校主要仰仗客家人的力量才得以建立，亦是所言非虛。而葉劍英、鄧演達、林振雄三人，後來也都分別在黃埔軍校裡擔任教授部副主任、教練部副主任（鄧氏原本爲主任，但謙讓給李濟深）以及管理部主任等高級職位。（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1982：504-505）

(二) 招生

黃埔軍校從 1924 年創辦到 1927 年大革命失敗爲止，總共招收了六期、約兩萬餘名學生。打從招生之初，客家人的報考即相當踴躍。以前四期的入學學生數字來看，第一批學生中，有 84 位爲廣東人，其中 30 位爲客家人。第二批學生中，有 58 位爲廣東人，20 位爲客家人；第三批，有 162 位學生爲廣東人，其中 85 個爲客家人（超過一半）；第四批，共有 205 位廣東籍學生，有 70 個爲客家人。爲何會有那麼高比例的客家人報考黃埔軍校，張天周（2001：202-205）認爲一者與客家素來重視教育的傳統息息相關；因爲黃埔軍校的報考資格除了對年齡、身體、思想各方面有所規定外，也對學歷有所規定。二者與客家人愛國愛民的民族性有關；由於客家人在歷史上飽受流離之苦，每到一處，便需經歷一段與當地文化的妥協或保衛，故其愛國

[43] 原載《文匯報》1956 年 11 月 10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主義和民族主義之心特別強烈。三者，加上當時「黃埔精神」的鼓舞，客家青年自是救國不落人後地報考黃埔了。

(三) 周恩來、黃埔與客家

周恩來（1898～1976），江蘇淮安人。周雖非客家人，但其在 1925 到 1931 年間的兩次東征以及共黨革命的八一南昌起義時，曾四度到潮汕地區。潮汕地區是客家人分佈的主要地區，周恩來在潮汕時的事蹟，基本上是得到正面評價且頗得地方人民之愛戴。在此僅從他在黃埔軍校、以及帶領二次東征這兩方面來談他和潮汕地區客家的關係。

周恩來向來對掌握革命武裝的問題十分重視，曾云：「真正革命非要有極堅強有組織的革命軍不可。沒有革命軍，軍閥是打不倒的。」（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1982：84）當他於 1924 年從法國返國初期、兼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時，其對於孫中山意欲以黃埔軍校建立革命軍的企圖，定然早已瞭然於胸，而且相當支持。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原由戴季陶擔任，然而戴氏不久即離職，改由邵元沖接任，但邵氏毫無作爲，引發師生的不滿，後再由周恩來接任邵氏成爲政治部主任。當時的周恩來年僅 26 歲，但卻年輕有爲，政治部在其大力整頓下，很快就建立工作制度，步入常軌；而學生們的政治教育也得到落實，整個政治部呈現煥然一新的氣象。周恩來在黃埔軍校政治部的績效，很快地就在隔年上場的第一次東征裡得到印證。

1925 年 1 月 15 日，廣東革命政府發表《東征宣言》，決定討伐陳炯明。當時的廣東革命軍分三路，中路和左翼分別由桂系和滇系軍隊所率，右翼爲粵軍負責；而甫成立不久的黃埔校軍則歸爲右翼粵軍的第二師和第七旅。然而，第一次東征的結果卻大大地跌破眾人的眼鏡。由於桂系和滇系隔山觀火，僅有右翼的粵軍（以黃埔校軍爲主力）以破竹之勢，直搗潮汕，獲得勝利。1925 年 10 月，革命軍進行第二次東征，完全平定東江，取得最後勝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兩次東征所經之地主要爲客家地區，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大獲全勝，與當地客家農民的大力支持有很大的關係。（張天周，2001：212-216）實際上，粵東地區的工農運動開展得很早，但東征前，許多農、工會被陳軍強制解散。而黃埔軍校革命軍不但在東征時期對當地人民進行政治教育，在東征結束後更進一步加強組織人民團體，使得粵東和東江客家地區的農、工會得到廣泛的復甦。這些都有助於當地人民對黃埔革命軍的支持。而周恩來既身爲軍校的政治部主任，自然在這之間具有決策者和執行者的作用。這點可反映在其對東莞人民所作的演說中：

> 本校希望東莞同胞者約有三事：一、爲革命軍向人民宣傳解釋，使之瞭解人民與革命軍之關係；二、實行民治，縣長民選；二、各界團體宜有強固之組織。（陳漢初（主編），2004：168）[44]

以下細述其在潮汕地區的作爲：

1. 政治宣傳

(1) 組織戰時宣傳隊

在東征出發前，周恩來先從第二期的黃埔學生中，挑選出會講廣東話、客家話、潮州話者 20 人，組成武裝宣傳隊，在軍隊開拔到當地前，先行在各村鎮宣傳東征的意義和目的。宣傳方式包括演講、張貼標語、發傳單、教導兒童唱《國民革命歌》。此外亦製作對敵宣傳的傳單，由飛機在敵軍陣地上空散發。（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1982：92）

[44] 原載上海《民國日報》1925 年 2 月 18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 舉行各種平民聯歡大會

當攻佔海豐、東莞後，政治部在當地動員舉行上千人的聯歡大會，周恩來在會上發表演講，號召人民支援革命軍。

2. 組織民眾

周恩來說：「人民如有強固之組織，則軍隊不敢橫行。」

(1) 第二次東征時，當東征軍占領海豐後，周恩來任命軍校第二期學生李勞工（廣東海豐客家人）「組織農民自衛軍教練所，地址設在橋東林祖祠，人數約六千（十）餘名」，（陳漢初（主編），2004：171）[45] 並從戰利品中撥出四百多支槍發給海豐農民自衛軍。此外亦恢復了被解散兩年多的海豐農會。（張天周，2001：216）

(2) 又命古大存（廣東五華客家人）在五華縣改組農會，同樣地贈予五華縣農會一百多支槍，加強其戰鬥力。（陳登貴，1988：30）

3. 大力整頓建設東江

1925 年 11 月 22 日，中國國民黨任命周恩來擔任東江各屬行政委員。周恩來在任職期間，大力整頓建設東江。（陳登貴，1988：27-31）

(1) 改組地方政權機構，嚴懲貪官汙吏（如惠陽縣縣長羅偉疆、五華縣財務局長張谷山），拔擢優秀人才（如原五華縣長溫其藩）。

(2) 大力建設東江

(3) 繼續發展農民運動。周恩來曾寫信給興寧縣縣長羅師揚（羅

[45] 原載《陸安日刊》，1925 年 3 月 18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香林之父）說：「至興寧、五華之農會及黨務，亦希與溫同志設法辦理，俾臻完善。」（陳漢初（主編），2004：65）1926年夏天，令羅明（廣東大埔客家人）在汕頭主持開辦東江農工運動養成所。

四、孫中山與臺灣客家的關係

(一) 孫中山在革命運動中與臺灣的關係

孫中山的革命思想種籽或許早已埋藏在他心裡已久，然而促使他就此決定採取革命路線的一個重要的事件，就是臺灣在《馬關條約》中被割讓給日本。當他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後，也派陳少白於 1897年來臺灣成立了臺灣興中會。而同理，當他在東京成立同盟會後，也於 1910 年派王兆培來臺灣成立臺灣同盟會，翁俊明即爲第一個會員。

從上可知，臺灣在孫中山的中國革命裡並未缺席，而臺灣的知識份子對孫中山在中國的革命運動也一直給予注目。

關於孫中山曾經幾度來台，有幾種說法，有人說兩次；有人說三次；也有人說四次。我贊成四次的說法：

1. 1900 年，坐鎮臺灣，指揮惠州起義，並計劃以臺灣爲軍火的轉運站。
2. 1913 年，討袁之役失敗後，孫中赴台尋求支持。
3. 1918 年，護法失敗，孫中山擬蒞台宣傳主義，但在日人阻擋下未達成目的，轉往日本。
4. 1924 年，孫中山爲推翻北洋軍閥的統治，毅然決定北上。途經臺灣，寄港基隆，未曾上岸。[46]

[46] 張春英、鐘祥勝。〈孫中山與臺灣〉。http://jds.cass.cn/Article/20050916132809.asp。2010/10/14 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 臺灣客家志士羅福星與孫中山的關係

羅福星出生於印尼的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其原籍爲廣東省嘉應州鎮平縣（今蕉嶺），故爲客家人。（羅秋照，1974：1-3）羅家自其祖父一代至印尼工作，而其父娶的亦是當地土生華僑，故其血統中尚具有荷蘭人和印尼人的雙重血統。當羅福星週歲時，隨其父母回到故鄉廣東，在那裡成長受教。但十歲時，又隨其祖父返回印尼就讀華僑中華學校。光緒 29 年（1903 年），羅福星中學畢業，即跟隨其祖父來到臺灣，居住於苗栗——堡牛欄湖庄（今苗栗縣造橋鄉豐湖村），並就讀於苗栗公學校。至光緒 33 年（1907 年）離台返鄉爲止，羅福星總共在臺灣待了四年。（覃怡輝，1981：9）

1. 孫中山革命思想對羅福星的影響

時正當孫中山的革命運動風起雲湧，羅福星於返鄉途中路經廈門時，便在某革命志士的介紹下，正式加入同盟會。但實際上，羅福星的革命思想，應該早在其年少時於印尼就學時便已埋下種籽。當孫中山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時，其革命思想風行海內外，印尼中華學校幾乎成爲興中會的分部，全校教職員十之八九都是革命同志，師生之間更是公開地談論和傳播孫中山的革命思想。（陳三井，1981：2）因此羅福星在耳濡目染下，對革命早已心生嚮往，也是相當有可能的。

加入同盟會後的羅福星，在正式投身起義前，主要是在南洋一帶從事教職和黨務宣傳工作。1908 年，其在同爲客家人的丘逢甲的介紹下，前往印尼爪哇視察僑校。之後，又先後轉往新加坡、緬甸及巴達維亞任職。直到三二九黃花崗之役時，羅福星從僑居地率領 17 位同志回國參加，雖然負傷敗退，但武昌起義後，又在黃興的號召下，在巴達維亞召募了兩千人的義軍，回國效命。羅福星不落人後地大加響應這兩場起義，可以說是其支援孫中山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 孫中山與羅福星抗日革命運動的關係

關於羅福星與孫中山的見面，有資料提到 1908 年，當孫中山與胡漢民前往曼谷時，羅福星曾前往謁見，並提出恢復臺灣之議。而當 1911 年辛亥革命起事後，羅福星帶領義軍返國參戰，但剛抵蘇州，南北議合即告成，孫中山遂命羅福星解散其部隊，來台策動革命反日運動。（蔣君章，1975：180）

而關於羅福星來臺領導抗日之原由，主要是奉國民黨之命而來。（覃怡輝，1981：36）此外，主要也是得到福建都督孫道仁的幫助、以及福州北伐軍聯團百長劉士明的邀請。羅福星曾於自敍裡提到：「辛亥年……，七月二日，接劉士明君函，促余奮起，往臺灣調查視察舉事。余喜，於七月三日起程至閩，得都督公文，與十二志士，先自南京，沿上海、天津、武昌、湖北一帶視察之後，十一月二日抵汕頭。九日，乘火輪船來台，到大稻埕。」（莊金德、賀嗣章（編譯），1965：44）上文中的都督即指孫道仁。

羅福星與其他 12 名志士抵台後，立即成立「同盟會支部」，對外則採用「華民聯絡會館」之名。「華民聯絡會館」的總部在苗栗，而羅福星正爲苗栗地區的負責人。由於羅福星在過去就讀苗栗公學校期間，即結識了許多同窗好友和鄉親，加上其本人具有客家人的身份，能夠在當地以客家語宣傳革命，故使他順利地在短短四個月間，即招募到五百多個人。[47]

羅福星深受孫中山革命思想的號召，其在宣傳革命工作時很清楚地提出：革命的目的是「驅逐日人，恢復臺灣」；而這個口號不正是孫中山的革命口號「驅逐韃擄，恢復中華」的臺灣版本？而在革命策

47 「余至苗栗，探民意，人民甚熱心有望。至二月底，已招募會員五百餘名。」（莊金德、賀嗣章（編譯），1965：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略上，羅福星亦說明革命的方式是配合中國革命軍的到來，裡應外合，一起驅逐日人；武器的來源亦主要從中國運來。（覃怡輝，1981：12）

綜上所述，羅福星在台的抗日運動，在組織上以華民聯絡會館作爲同盟會在臺灣之分部；在思想上以孫中山的革命宗旨作爲號召；在方法上強調與中國的合作，在在都顯示羅福星在台的抗日運動，是綿延了孫中山在中國的民族革命，可以說是中國革命在臺灣之支流。

陸、結語

以上簡單的考察，已能約略反映出客家人在 19 世紀中到 20 世紀初的中國革命運動裡，確實於各方面占據重要的位置。有以領導者之姿出現者，如洪秀全、孫中山；有居於重要幕僚者，如馮雲山、廖仲愷；也有跟隨、響應者，如太平天國起義中的廣西農民、以及在二次東征裡幫助革命軍的農工。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的現代政治舞臺彷彿是爲客家人而設的。

其中原因，除了英國傳教士艮貝爾所云「客家人比城裡人勇敢，富有特立獨行的氣慨，渴愛自由」外，筆者以爲最大原因有兩個；首先是客家人重視教育、耕讀的風氣。客家人無論遷徙到哪裡，都很重視後輩的教育。而中國傳統忠孝節義的觀念、以及漢人的國族意識，即透過教育深刻地保留在客家文化裡。再者客家一直維持耕讀的風氣，所以客家子弟在讀書之餘，耕種和親近土地的生活方式能塑造其樸素堅忍的特性。因此客家人特別有國族意識，特別有氣節，與其所接受的教育以及生活方式有很大的關係。

再者，筆者以爲堅強有韌性的客家婦女，是令客家男子可以較無後顧之憂，投身革命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比起一般漢人婦女，客家婦女總是既能幹又獨立，經常能夠支撐起一個家內外的所有事。因此形成其支持丈夫全心全意投身革命的客觀條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最後，筆者再度強調的一點是：發生在 19 世紀中、20 世紀初的由客家人所肇發的中國革命運動，無論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或是孫中山的辛亥革命，規模都相當宏大，且歷時皆很長，但其共同的特點，即他們的革命運動所號召的是全中國人，目標爲推翻滿清，重建中國。1852 年，太平軍發佈《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說：「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胡罪貫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肅將天威，創建義旗，掃除妖孽，廓清中夏……。」而孫中山的革命運動裡，興中會和同盟會的宗旨皆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由此可知，這些革命運動的發起人儘管是客家人，但他們的客家意識是歸屬於整體漢人中華的族群意識之下：太平天國雖然表現出極爲濃厚的客家性，但只是表露在政治制度和文書上，成爲一個反映其領袖群出身背景的表徵，而從未上升至強調客家意識、以客家號召革命建國的高度。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則更是一方面直接把客家意識融入五族共和的大中華意識中；另一方面，則成功地把握和運用客家的族群性質——作爲一個「離散族群」散居世界各地的一個族群性質，使之成爲其推展革命運動、成立革命團體時不可或缺的助手。

與客家人在中國的革命起義恰好成爲對比的，是晚太平天國幾年相繼發難的數次回變。1855 年雲南穆斯林杜文秀因爲清朝官吏貪腐，於雲南蒙化號召回民反抗，他起事後攻陷大理等雲南五十座城市，建立大理政權，國號平南，自任撒里曼蘇丹，接下來的十八年，雲南大理平南國爲一獨立政權，直到 1872 年清廷攻下大理、杜文秀自殺才告終。而 1862 年，陝甘穆斯林也趁太平天國和撚軍在陝西動亂，起義想建立獨立國家，一直到 1873 年才被平定。筆者在此之所以提到回變，是因爲相較於太平天國或孫中山的革命，中國穆斯林（回民）的起義目的是爲了尋求回民自治，甚至是建立回民自己的國家。這明顯反映出中國回民本身對大中國華人族群意識似乎是缺乏認同的。儘管中國回民其實在血統上主要也是漢人血統（最初是漢人與西域來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傳教的外國穆斯林的混血，但後來已變得相當漢化）。

因此相對之下，客家－無論是羅香林所云的純正中原漢人，抑或房學嘉所提出的南下漢人與越族的混合，[48] 其文化體系，或說其骨子裡，的確是以漢化的一員自居且引以爲榮的；而客家人在中國現代政治革命裡的訴求，恰爲這點的最佳例證。

48 關於房學嘉對客家源流的看法，請參見房學嘉（1994）。《客家源流探奧》。廣東：廣東高等教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王慶成（2001）。〈客家與太平天國起義〉，邱權政（編），《客家與近代中國》，頁 46-66。臺北：武陵。

古　直（1970）。《客人對》。臺北：文海。

李志綱（1994）。〈香港客家教會（巴色會）之設立及其在廣東與北婆羅洲之傳播〉，謝劍、鄭赤琰（主編），《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頁 241-252。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海外華人研究社。

邱　濤（2001）。〈戊戌時期梁啓超的政黨思想與客家精神〉。邱權政（編），《客家與近代中國》，頁 219-241。臺北：武陵。

周恩來（2007）。《周恩來自述》。北京：解放軍文藝。

金沖及（主編）（1989）。《周恩來傳 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

房學嘉（1994）。《客家源流探奧》。廣東：廣東高等教育。

胡漢民（1981）。〈胡漢民自傳〉，邱權政、杜春和（選編），《辛亥革命史料選輯》上，頁 156-233。長沙：湖南人民。

郝盛潮（主編）（1994）。《孫中山集外集補編》。上海：上海人民。

孫中山（1956）。〈太平天國戰史序〉，孫文，《孫中山選集》，頁 54-55。北京：人民。

孫中山（1957）。〈在歐將去美國時致倫敦吳敬恆函〉，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國父全集　第五冊》，頁 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85。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孫中山（1981a）。〈與宮崎寅藏等筆談〉，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孫中山全集 第 1 卷》，頁 175-186。北京：中華書局。

孫中山（1981b）。《建國方略》，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孫中山全集 第 6 卷》，頁 157-493。北京：中華書局。

孫中山（1981c）。《中國革命史》，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孫中山全集 第 7 卷》，頁 59-70。北京：中華書局。

徐輝琪（2001）。〈客家與辛亥革命〉，邱權政（編），《客家與近代中國》，頁 126-166。臺北：武陵。

張天周（2001）。〈客家人與黃埔軍校〉，邱權政（編），《客家與近代中國》，頁 194-218。臺北：武陵。

張玉法（1975）。《清季的革命團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張興漢（1994）〈客家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貢獻〉，謝劍、鄭赤琰（主編），《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頁 839-84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海外華人研究社。

莊金德、賀嗣章（編譯）（1965）。《羅福星抗日革命案全檔》。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陳三井（1981）。《羅福星與中國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陳春生（1957）。〈壬寅洪全福廣州舉義記〉，柴德賡等（編），《辛亥革命》，頁 315-321。上海：上海人民。

陳登貴（1988）。〈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周恩來奮戰在廣東的功績〉，「周恩來研究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編輯組（編），《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恩來研究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 18-31。北京：中央文獻大學。

陳　雄（1957）。《黃花岡革命烈士傳》。臺北：陳雄。

陳漢初（主編）（2004）。《周恩來在潮汕》。北京 ： 中央文獻。

覃怡輝（1981）。《羅福星抗日革命事件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黃沄、黃錫燾等（2006）。《經鏗黃氏家譜》。北京：北京燕山。

黃阿新（1965）。《姓氏與黃姓源流考》。臺北：黃阿新。

黃培棋（1991）。〈關於陳承瑢、秦日綱籍貫的新資料〉，《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19-21。

黃基正（1965）。《黃氏家譜》。苗栗：苗友出版社。

馮自由（1954）。《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臺北：世界書局。

馮自由（1969a）。《革命逸史 第一集》。臺北：正中書局。

馮自由（1969b）。《革命逸史 第五集》。臺北：正中書局。

馮自由（1977）。〈檀香山興中會之發源與復興〉，蔣永敬（編），《華僑開國革命史料》，頁 87-95。臺北：正中書局。

楊慶平（1990）。〈孫中山的家世與客屬淵源〉，吳澤（主編），《客家學研究》2，頁 66-69。上海：人民。

蔣君章（1975）。《台海風雲人物》。臺北：中外。

廣西省太平天國史調查團（1956）。《太平天國起義調查報告》。北京：三聯。

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1982）。《黃埔軍校史料》。廣州：廣東人民。

潘光旦（譯），Huntington, Ellsworth（原著）（1929）。《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上海：新月。

劉強倫（2006）。《百年家族——黃興》。石家莊：河北教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賴曉萍（2002）。《丘逢甲潮州詩研究》。私立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蕭致治（2005）。〈黃興家世及其早年研究〉，《黃興與辛亥革命》，頁 1-17。長沙：嶽麓書社。

戴興明（1988）。〈國父與鍾木賢〉，《客家風雲》8：37-39。

鍾文典（1962）。《太平軍在永安》。北京：三聯。

鍾文典（1981）。〈論太平天國革命發生在廣西的原因〉，北京太平天國歷史研究會（編），《太平天國史論文選》上，頁 201-211。北京：三聯。

鍾文典（1991）。〈客家與太平天國革命〉，《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1-10。

簡又文（譯），Hamburg, Theodore（原著）（1976）。《太平天國起義記》。臺北：文海。

簡又文（1983）。《金田之遊及其他》。臺北：文海。

韓志遠（2001）。〈客家人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廣東革命運動〉，邱權政（編），《客家與近代中國》，頁 167-193。臺北：武陵。

羅香林（1954）。《客家源流考》。臺北：商務。

羅香林（1992）。《客家研究導論》。臺北：南天。

羅秋照（1974）。《羅福星傳》。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羅爾綱（1943）。〈亨丁頓論客家人與太平天國事考釋〉，羅爾綱（編著），《太平天國史叢考》，頁 91-96。北京：正中。

羅爾綱（1958）。《太平天國史蹟調查集》。北京：三聯。

羅爾綱（1981）。〈金田起義事實考〉，北京太平天國歷史研究會（編），《太平天國史論文選》上，頁 224-237。北京：三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英文部分

Linebarger, Paul (1969). *Sun Yat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New York & London: The Century Co..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Role of Hakka People in Chinese Revolution in Modern History of China—Taking Taiping Revolution and Xinhai Revolution as Examples

Manouchehr Ghorbani-Koshkaki

Abstract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is the role of the Hakka peop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 The first part addre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kka figures and Chinese social movements and uprisings, includ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some revolutionary groups and activities during the Xinhai Revolution period.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Sun Yat-sen as a key factor in Chinese history. In this part, I emphasize Sun Yat-sen's Hakka identity, and also his revolutionary comrades. This part also examines the role of Hakkas in his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s (Xingzhong Association and Tongmeng Association), revolutionary battles (Huizhou Uprising and Huanghuagang Uprising), and revolutionary army (Huangpu Military School). The final section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ocusing on Fuxing Luo, an ethnic Hakka, and his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Keywords: Hakka, Chinese revolution, Sun Yat-sen, Fuxing Luo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